

戰後臺北高等學校「蕉葉會」 之成立及其活動

王麒銘

摘 要

臺北高等學校成立於1922年，主要成員是日本人教師與學生，臺灣人學生居少數。該校自1928年送出第一屆畢業生，至1946年總計培養二千餘位日本人畢業生、約六百位臺灣人畢業生，多數進入各帝國大學就讀，為戰前日本與臺灣社會菁英的來源之一。日治時期該校同窗會設在校內，由住在臺北的校友負責運作。

1945年日本戰敗後，日本人陸續接受遣返回國，臺北高校日籍師生須克服就職、轉學等問題，故師生間與校友間的關係難以維繫。1950年前後逐漸出現以「蕉葉會」為名的小型聚會，同窗會名簿也初步完成。到1960年代以降，蕉葉會選出會長與主要幹部後，會務漸上軌道，成為凝聚日籍師生的象徵。該會定期舉辦新年會等聚會，並將相關消息刊登在會報與臺灣協會發行的刊物上。此外，會員們於1970年出版《臺北高等學校》一書，用以紀念母校。蕉葉會不僅讓日籍師生維持聯繫與擴張人脈，亦是日本人校友與臺灣人校友強化人際關係的組織。本文究明蕉葉會成立的時代背景，並詳探其活動內容，討論範圍以戰後至1972年臺日斷交為主，藉以考察臺日關係一個重要的面向。

關鍵詞：臺北高等學校、蕉葉會、同窗會、臺日關係

The Organization of Taihoku Higher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in Japan and Its Activities from 1945 to 1972

Chi-ming Wang^{*}

Abstract

The Taihoku Higher School in Taipei, founded in 1922, mainly employed Japanese faculty members and accepted Japanese students, with few Taiwanese working or attending there. Since the first cohort graduated in 1928, the school had produced more than 2000 Japanese graduates and 600 Taiwanese graduates by 1946.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in Taiwan, a *dosokai* (i.e., student reunion clubs) was established at the school and was run by alumni living in Taipei in order to help other alumni visit the school.

After World War II, as Japanese people in Taiwan were repatriated, Japanese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at the school were faced with problems concerning reemployment and school transfer. Consequently, maintaining the *dosokai* became difficult. Around 1950, small-scale reunions were hosted under the name of *shoyokai* (Banana Leaves Association) by alumni in Japan and, despite challenges in contacting former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 alumnus contact list was created by this association. In the 1960s, a president and main executive members were selected by association members for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shoyokai*, which began to operate regularly and became a crucial symbol that united Japanes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association regularly hosted New Year's events and other meetings, posting event information on newsletters published by the headquarters and its Taiwan branch. In addition, association members jointly edited a book titled *Taihoku Higher School* in 1970 to commemorate their school. The *shoyokai* not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only assisted Japanes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maintaining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and expanding their personal connections, but also served as a medium for Japanese and Taiwanese alumni to strengthen their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during which *shoyokai* was established and examines the content of its activities. It thus provides an essential viewpoint regard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from 1945 to 1972, when Taiwan and Japan severed diplomatic ties.

Keywords: Taihoku Higher School, *Shoyokai*, *dosokai*, Taiwan-Japan Relations

戰後臺北高等學校「蕉葉會」 之成立及其活動*

王麒銘**

壹、前言

1922年成立的臺灣總督府高等學校，1927年改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簡稱臺北高校，校址位於現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內。本文在既有的校史研究成果之上，探討該校從戰前到戰後的同窗會組織，考察該會的活動，分析校友在不同時代扮演的角色，呈現同窗會研究對理解近代臺日關係史的重要意義。

臺北高校歷史迄今將近百年，校史研究起步卻是相當晚近的事。近十餘年來，在蔡錦堂、徐聖凱等人的努力下，針對創校經緯、師資構成、學生來源、校風、戰時與戰後初期的校園、畢業生在臺日兩地的表現等，均有具體的分析，使該校的面貌變得更加清晰。¹ 此外，津田勤子致力於研究學生刊物，包括新聞社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21年7月8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8月16日。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¹ 簡言之，約2006年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臺師大）臺灣史研究所蔡錦堂教授帶領研究生從事臺北高校資料蒐集、校友及家屬等相關人士訪談，並在臺師大圖書館建置臺北高校資料室。在其指導下，已完成數篇碩、博士論文。臺師大也召開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從各種角度回顧校史。主要成果如下：蔡錦堂，〈日本治臺後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收入亞東關係協會編，《2007年臺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臺北：外交部，2007年）；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新北：Airiti Press，2012年）；蔡錦堂編，〈「臺北高

的《臺高》、文藝社的《翔風》、及學生間流傳的小型刊物，析論他們的教養、思想、精神世界，有助吾人更加理解日治中後期至戰後初期年輕學子的心態。² 1945年日本戰敗後，短期間內該校仍存在，惟僅維持到1946年。對於接收改制後成立的「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1945-1949年，與省立師範學院並存），則有賴冠旻的實證研究值得參考。³ 儘管有關臺北高校已累積豐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對於日本人校友、臺灣人校友的整體與個案研究，以及同窗會組織等，尚有進一步究明的餘地。

如所周知，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設立各級新式教育機構，至1920年代已建置初等教育設施到高等教育機關的體系。從各級學校畢業的學生出社會以後，藉由參加校友會、同窗會及校慶等活動，與母校保持一定的關係，也有機會認識其他校友，實是擴大人際網絡的管道之一。此類組織或團體成立後，根據會章和共識來推展會務，提高會員的向心力，必要時亦能發揮動員力量。這些遍布全臺的各種校友會與同窗會，對臺灣社會而言屬於新事物，可說是一種新的交流模式，但往往僅在校史書寫中被略為提及，特別對此的研究仍然不多。就閱見所及，陳文松曾研究1912年成立的國語學校同窗會（後改稱國師同窗會，由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的臺灣人組成），介紹該會設立後以迄戰爭初期的活動梗概，並分析其所蘊含的社會史意義。⁴

等學校創立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4年）；徐紹綱，〈臺北高等學校學徒兵的徵召與實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年）；津田勤子，〈戰時下台湾の高等学校生と文芸：旧制台北高等学校「雲葉」と「杏」雜誌から見るエリート学生達の世界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7年）；蔡錦堂，〈新竹中學校出身的臺北高等學校生初探〉，《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0期（2017年12月），頁123-150；林祐里，〈「灣生」川平朝清與其家族探討：臺灣、琉球與日本的邂逅〉（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

² 津田勤子，〈日治末期台湾エリート青年の台湾描写——台北高校回覧雑誌『杏』を例に——〉，《文史臺灣學報》，第13期（2019年10月），頁173-209；津田勤子，〈日治時期臺籍高校生作品研究——以臺北高等學校《臺高》、《翔風》為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31期（2020年10月），頁73-115。

³ 賴冠旻，〈新舊政權夾縫中的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1945-194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年）。

⁴ 陳文松，〈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頁219-274。

日本方面與臺灣有關的同窗會陸續且大量的成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事。戰後，日本人被遣返，揮別臺灣、回到日本以後，必須面對嚴厲的生存環境、重建生活根基，與臺灣母校的關係不免隨著歲月流逝而逐漸疏離。顏杏如的研究指出，當日本人的生活漸告穩定，過去擁有共同外地經驗者接連組成同窗會及地區性的聚會。⁵ 又根據林初梅的研究可知，日本人回國後，透過同窗會、同鄉會等方式聯繫彼此並關心臺灣，最主要原因是懷著對臺灣的鄉愁。林並指出1964年日本解除對出國觀光的限制後，日本人開始組團來臺訪問母校，進行兼具懷舊與知新雙重意義的旅行。⁶ 該文以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今臺南二中）為例，分析日本人校友與臺灣人校友（又分戰前與戰後世代）、及校方的互動，是目前有關戰後日臺之間同窗會與校友會的重要研究。而本文探討的臺北高校「蕉葉會」，更是戰後日本國內與臺灣有關係的同窗會中，甚具份量的團體，應無可與其倫比者。在戰後的日本，日治時期臺灣設立的高等教育機關之同窗會，以臺北帝國大學相關者為主；⁷ 此外則有臺北高校蕉葉會、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綠水會」、及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鳳木會」。⁸ 其中，蕉葉會因成員有許多人居居日本各界要職，故該會的活動頗受矚目。

關於臺北高校日本人師生在戰後日本的發展情形，先行研究略有提及。在蔡錦堂與王麒銘合寫的論文，釐清五位校長就任及離職經緯，探討該校發生的人事糾紛、學生罷課事件等，並分析部分教師的學養風格。同時，該文利用蕉葉會相關資料，初步觀察1940至1960年代之間教師的動向，以及戰後該校師生在日本

⁵ 顏杏如，〈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在臺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收入若林正文、松永正義、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年），頁213。

⁶ 林初梅，〈灣生日本人同窗會及其臺灣母校——日本引揚者故鄉意識與臺灣人鄉土意識所交織的學校記憶〉，收入林初梅、所澤潤編，《戰後臺灣的日本記憶——重返再現戰後的時空》（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17年），頁307-359。

⁷ 包括文政學部青榕會、理農學部同窗會、醫學部東寧會、工學部の會，以及臺北醫學專門學校與臺北帝大附屬醫學專門部之南溟會、臺北帝大附屬農林專門部與臺中高等農林學校之榕畔會、臺北帝大預科蘭香會。

⁸ 財團法人臺灣協會，《台灣協會會員名簿》（東京：財團法人臺灣協會，1989年），頁146；財團法人臺灣協會，《台灣同窓會便覽》（東京：財團法人臺灣協會，1995年），頁1-5。

如何重新取得聯繫的過程。⁹ 此外，鍾淑敏於留學日本期間認識臺灣出生、臺北高校畢業的山口政治（1944文甲），¹⁰ 得以有機緣參加校友的聚會，更有鑑於研究臺北高校的人脈對理解戰後臺日間政經關係之重要性，於是從此一角度進行探究，富啟發性。雖然該文言及蕉葉會成立於1961年，但未對該會加以詳論。¹¹

本文首先重建日治時期臺北高校同窗會的梗概，作為理解戰後蕉葉會的基礎。其次究明蕉葉會成立的時代背景與經過，進而考察該會的活動，並對參與蕉葉會的少數臺灣人提出看法。限於篇幅，主要以1972年臺日斷交前為研究範圍。使用資料以蕉葉會相關文獻為主，輔以校友等人的回憶錄、日記，及筆者參加臺北高校蕉兵會的聚會、訪談所得資料等，期能對臺日關係史上一個重要的面向有更深入的認識。¹²

貳、日治時期臺北高校同窗會之梗概

所謂舊制高等學校（相對於現行、屬於中等教育機關的新制高等學校），是

⁹ 蔡錦堂、王麒銘，〈臺北高等學校的校長與教師群像〉，收入蔡錦堂編，《「臺北高等學校創立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65-192。

¹⁰ 對熟悉東臺灣史研究的人來說，山口的名字應該不陌生。山口自京都大學法學部畢業後任職勞働省，公餘參與蕉葉會活動，同時對促進日臺交流、東臺灣研究極為積極，撰有關於東臺灣的著作多本。必須說明的是，本文提及的校友眾多，儘管不乏臺灣與日本的知名人士，但絕大多數校友的生平仍有待考證，一一列出其生卒年，誠屬難事。本文為了閱讀方便、避免繁瑣，僅在臺北高校校友姓名之後以括號說明畢業年與班別。例如，山口是1944年文科甲類（班）畢業，可縮寫為1944文甲。而對少數較為人所不熟悉者，另外加註其學經歷等基本資訊。

¹¹ 鍾淑敏，〈台北高校的師弟と戦後の日台関係における人脈の展開〉，收入檜山幸夫編，《轉換期の台湾史研究》（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2015年），頁305-333。

¹² 「蕉兵」指1944與1945年入學，1945年3月因召集令發動而集體入伍的高等科一、二年級生（包含臺灣人、日本人）。他們變成二等兵，在草山（陽明山）等地從事構築防備美軍登陸的工程等。戰後雖然復學，不久日本人被遣返，日本人蕉兵們亦離開臺灣。到1990年前後，年約60歲的他們擇定當年入隊日與「廢校」日，每年相聚兩次。1993年10月起，蕉兵會固定每月在東京有樂町聚會，直到2020年因受到COVID-19肺炎影響，原本固定於每月第四個星期五在新橋舉辦的聚會被迫停辦，改以電子郵件和傳真方式匯集會員與會友的文章。筆者曾參加蕉兵會數次，獲益甚多。

日本從明治時期到戰後初期的高等教育機關之一環，用以培養準備就讀官公立大學的男學生。臺北高校是日本設在殖民地臺灣唯一的高等學校，係七年制高校，設有尋常科（四年制）與高等科（三年制），前者招收小學校與公學校畢業生，每年1班僅40人可以入學，能入學者的資質非比尋常；後者招收4班（文理兩科各有甲乙兩類／班），總共160名，學生來自尋常科直升者及中學校出身者（中學校為五年制，第四學年可報考高校）。換言之，只有120個名額保留給中學校學生。克服升學難關而就讀這所殖民地臺灣唯一的高校者，在良好的師資陣容與優美的校園環境中，享有自由探索本身潛力，以備升入帝國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關。他們進入社會經過歷練後，往往成為領導階層，例如官僚、教授、公司高層、各領域的專家等；而在高校階段即建立的人脈，透過同期和前後輩的關係不斷擴張，說是終身受用的資源也不為過。

臺灣總督府設立高等學校後，由於當局的差別待遇政策，名額有限、考試方式不公等因素，限制了臺灣人就讀該校的機會。1928年3月，臺北高校送出第一屆畢業生，文科甲乙兩類共26人，理科甲乙兩類共48人，合計74人。其中最為學界熟知者，或許是研究臺灣經濟史的東嘉生與平山勳（原姓井手）。¹³ 首屆的臺灣人畢業生僅有4位，即理乙同班的黃春木、蔡雨澤、徐慶鐘、劉興文。¹⁴ 畢業生詳細名單刊登於該校每年出版的一覽，之後成為慣例。自第二屆起，每屆的畢業生人數約在120人，到了日本與中國爆發戰爭的1937年，已有十屆畢業生，總共1,235人，文科有622人，理科有613人，人數不相上下；進而觀之，臺灣人有275人，日本人有960人，臺灣人約占22%，不滿四分之一的比例。¹⁵ 總計自1928至1946年為止，該校培養二千餘位日本人畢業生、約六百位臺灣人畢業生。

畢業生與母校的聯繫管道為臺北高校同窗會。同窗會之全貌由於資料限

¹³ 東嘉生就讀臺北帝大，畢業之後留校從事研究，1943年升任助教授，同年11月在回臺的航程途中遭遇美軍攻擊而遇難。關於他的研究業績，參閱黃紹恆，〈臺北帝國大學經濟學講座的誕生與發展〉，收入蔡祝青編，《迎向臺大百年學術傳承講座 I：臺北帝大文政學部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年），頁364-367。

¹⁴ 《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自昭和三年至昭和四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1929年），頁140-142。

¹⁵ 《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昭和十二年度）》（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1937年），頁140-176。

制，無法全盤掌握，目前僅能根據1941年12月的《會員名簿》，略窺該會的組織原則。據此可知，該會的會則（1931年5月修改）內容計18條，較重要者歸納如下。

首先，在組織方面，該會會長推舉臺北高校校長擔任；理事15名，包括特別會員2名，以及住在臺北的通常（一般）會員13名，負責庶務、編輯、會計。每年召開總會（即年度大會）一次。會費3圓，於學生繳交高等科第三學年第二學期授業料（學費）時徵收。換言之，學生在畢業前的最後一學期繳交會費。該會的本部置於臺北市，事務所設在校內，另外得在多數會員居住的地方設立支部。其次，在會員方面，一般會員以畢業生為主體，曾經在學者經過理事會承認可成為會員；特別會員則由現任教職員及卸任教職員構成。¹⁶ 要之，臺北高校校長擔任同窗會會長，師長為特別會員，畢業生等人為一般會員，即將畢業的學生則預先繳納會費，同窗會藉此方式維持運作。

儘管戰前的同窗會名簿相當罕見，透過報紙的報導仍多少可以掌握該會概況。包括，在日本內地就讀大學的臺北高校畢業生，利用歸省的機會抽空回校相聚，這樣的活動也歡迎在校生出席參加。¹⁷ 不難想像校友們回到曾經度過三年，甚至是七年的校園時，彼此交換心得、增進友誼的情景。又1936年時，住在臺北市內的同窗會員已達260人，在5月15日午後，假川端町紀州庵（今同安街上）召開同窗會總會。翌年5月，該會同樣選在紀州庵聚會。¹⁸

1937年7月戰爭爆發後，臺北高校同窗會先是調查會員應召入伍的情形，理事會還決定到年底前向會員們募集慰問金，用以慰問相關的會員。臺北高校師長包括谷本清心校長、庄司萬太郎、南柯夢樓主人（中村為吉的筆名）、小山捨男、西田正一、荒川重理等人所寫的慰問文字，也登在1938年2月出刊的《臺高》雜誌第7號。該期並刊登谷本校長等人親筆的「寄せがき」（簽名留念），

¹⁶ 《會員名簿》（臺北：臺高同窗會，1941年12月），頁5-8。

¹⁷ 〈臺北高校同窗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2年8月5日，版7；〈臺北高校同窗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5年8月8日，版2。

¹⁸ 〈臺北高校同窗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年5月12日，版2；〈臺高同窗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7年5月21日，版11。

而谷本校長還題了「義勇奉公」。¹⁹ 收到《臺高》的臺北高校畢業生，有機會閱讀師生的文章及了解校內動態，內心想必歡喜；以擔任陸軍中尉的荒木宣夫（1932理乙）為例，他還表示凱旋之後想回臺北。²⁰ 當時曾發生一件意外的插曲，即同窗會寄出慰問品送給受召入伍的會員，然而由於發送作業產生疏失，同窗會只寫寄件人為臺北高等學校，漏寫了同窗會，導致會員們回覆的感謝函都寄到校方，為此還特別刊登道歉啟事。²¹

1941年8月，谷本清心校長卸任時，臺高同窗會對其表達謝意。谷本於1907年自東京帝大理科大學理論物理學科畢業後，同年來臺擔任總督府國語學校教授兼總督府中學校教諭（即教師，以下沿用當時職稱），1911年轉任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到了1925年再度來臺擔任臺北高校教授。²² 1931年9月，谷本繼下村虎六郎之後，擔任臺北高校第四任校長，直到1941年8月卸任，前後擔任校長職有十年之久。²³ 臺高同窗會訂於8月29日假鐵道飯店舉辦送別會，並請住在臺北市內的會員欲參加者、或不克出席者，宜事先通知山地清（1928文甲）教授。²⁴ 另外，臺北高校的父兄代表6人，也親自訪問谷本家，表達感謝之意並致贈紀念品。²⁵ 同年底發行的《臺高同窗會名簿》也通知會員，「谷本先生功績記念醖金

¹⁹ 〈同窓會慰問欄〉，《臺高》，第6號（1937年12月），頁21-27。

²⁰ 〈戰地からの便り〉，《臺高》，第7號（1938年2月），頁26。

²¹ 〈応召同窓會員諸兄に〉，《臺高》，第9號（1938年7月），頁19。

²² 「谷本清心任中學校教授」（1907年8月18日），〈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三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1342033。「中學校教諭谷本清心轉任照會」（1911年1月25日），〈明治四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一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1869008；「〔府高等學校教授〕谷本清心（陞等、俸給、敕任待遇）」（1925年5月1日），〈大正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三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4002033X001。

²³ 「谷本清心任臺北高等學校校長、俸給」（1931年9月1日），〈昭和六年七月至九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10066079；「谷本清心（依願免本官；賞與）」（1941年8月1日），〈昭和十六年七月至八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10113A50X001。

²⁴ 〈臺北高校同窓会で谷本前校長の送別会〉，《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1年8月28日，版2。

²⁵ 〈谷本前臺高校長に記念品を贈呈〉，《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1年8月31日，版3。父兄代表中有2位是臺灣人，即魏清德、桂（舊姓翁）瑞春。

募集」期限從原定的12月底截止，展延至1942年2月底。²⁶ 由此例可見，對於離職師長表達心意，是同窗會的功能之一。谷本校長離職後，新校長為下川履信，根據上述會則之規定，下川校長即是新任的同窗會會長。

關於臺北高校同窗會的理事人事與一般會員，以上述名簿發行時的1941年12月而言，特別會員2名為甲斐三郎與森政勝教授，住在臺北的一般會員13名之中，負責庶務的理事5名，負責編輯的理事6名，負責會計的理事2名。負責庶務的理事為：田大熊（1929文甲，任職總督府外事部第二課）、長尾新吾（1929文乙，總督府官房文書課）、中村孝明（1930文甲，內務局地理課）、瀧澤壽一（1931文乙，臺北高校教授）、都留長彥（1932文甲，臺北帝大學生課）。負責編輯的理事為：山地清（臺北高校教諭兼教授）、古城坤三（1928理乙，臺北帝大附屬農林專門部）、中治申吾（1929文甲，臺灣自動車會社）、鈴木武雄（1929理甲，殖產局農務課）、木藤才藏（1936文甲，臺北高校教諭）、犬童一男（1936理乙，臺北帝大醫學部生科學教室）。負責會計的理事為：谷島晴之（1928文甲，勸業銀行臺北支店）、濱田隼雄（1929文乙，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13名會員中有2位在母校任教，一位是山地清，1931年自東京帝大文學部英語學科畢業，翌年12月擔任臺北高校講師，教授尋常科與高等科的英語課程，1934年擔任教諭兼助教授，1938年3月兼教授職。²⁷ 另一位是瀧澤壽一，1934年自東京帝大文學部德國文學科畢業，並在大學院（相當於研究所）從事研究一年半後，1940年10月返臺擔任臺北高校講師，教授高等科的德語課程，翌年5月升任教授。²⁸ 由上可見，同窗會幹部主要是以第一和第二屆畢業生為主體。1941年

²⁶ 此係放入前引《會員名簿》中約7×13公分大小的紙張。

²⁷ 「山地清（任高校教諭兼高校助教授；俸給）」（1934年3月1日），〈昭和九年一月至三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10240044；「山地清任臺北高等學校教諭兼臺北高等學校教授、敘高等官七等、八級俸下賜」（1938年3月1日），〈昭和十三年一月至三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10092138。山地於戰爭末期受召出征，據云被擊沉於巴士海峽。參見瀨邊惠鎧，〈戰没した三人の同僚〉，收入《台北高等学校》（東京：蕉葉會，1970年），頁256-261。又根據該書頁112校友木村正道（1940文甲）的說法，山地身先士卒戰死於菲律賓。

²⁸ 「瀧澤壽一（任高校教授）」（1941年5月1日），〈昭和十六年五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10111047。

11月當時，一般會員共計1,734人（第一至第十四屆的高等科畢業生）。²⁹ 戰爭末期，臺北高校同窗會是否繼續編輯名簿，現存狀況不詳，暫難斷言。惟就時代背景推察，同窗會業務停擺的可能性極大，應該無新的名簿問世。

1945年8月，戰爭結束後，臺北高校被接收改制為臺北高中。翌年7月，前臺北高校師生在公會堂（今臺北市中山堂）召開臺北高等學校同學會成立大會，這是臺灣人校友組成的同學會，由第一屆畢業生徐慶鐘出任理事長。³⁰ 徐以外的理事有朱華陽（1929文乙）、魏火曜（1929理乙）、黃啟瑞（1933文甲）、周百鍊（1933理乙）、林維吾（1934文甲）、顏朝邦（1938理甲）、古廷正（1937文甲），以及候補理事5人與監事3人。³¹ 戰後迄今，由臺灣人組成的臺北高校同學會（簡稱臺高會），歷任會長為徐慶鐘、劉闊才（1932文乙）、³² 楊基銓（1937文乙）、黃伯超（1945理乙）、辜寬敏（1946文）。³³ 臺灣人校友組成的同學會，除了是各屆校友間聯繫的管道，有時亦帶家人參加，成為跨世代交流的機緣。³⁴

二次大戰後，前臺北高校畢業生在臺、日兩地分別組成同窗會，臺灣校友先成立同學會，日本校友則晚數年才成立蕉葉會。蓋臺北高校日籍師生等待遣返日本，也有部分的日本人遠從臺灣以外的地方回到日本，他們都必須面對就職、就學等問題，以求立足於日本社會。因此，要重建戰前原有的同窗會組織，需要一

²⁹ 根據前引《會員名簿》中收錄的「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卒業生學科別人員表」（未編頁碼），其中，住處不明者8人，死亡者63人，未交會費者258人。換言之，約有8成的會員繳交會費。

³⁰ 蔡錦堂主訪，徐聖凱著，《黃伯超先生傳》（臺北：前衛出版社，2012年），頁274。另一說是1945年12月「臺高同學會成立，當選為會長」。參見《徐公慶鐘辭世十周年（百歲冥誕）追思集》（臺北：徐慶鐘追思集編撰小組，2006年），頁52。

³¹ 〈臺高同學會 依法成立開大會〉，《民報》，1946年7月22日，版2。

³² 有關劉闊才的生平事蹟，參閱蔡錦堂，《立法院院長劉闊才傳記》（臺中：立法院議政博物館，2015年）。

³³ 楊基銓，《台湾に生を享けて》（東京：日本評論社，1999年），頁458-459，中譯本參見楊基銓，《楊基銓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頁464。餘見臺高會的名簿等資料。

³⁴ 例如，前副總統陳建仁即曾陪同父親陳新安（1931文乙）參加此類活動。參見陳建仁，〈李登輝總統為我上的最後一堂課〉，《台高·師大通訊》，第2期（2020年10月），頁8-9。

段歲月。校友們對蕉葉會的描述，例如，山口房雄（1938文乙）認為臺北高校畢業生分處日本與臺灣，友情卻更加深厚；有朋自遠方來時，則舉行歡迎會加以招待。³⁵著名的作家及投資家邱永漢（1942年9月文甲）也認為若論畢業生之間的連帶感，臺北高校可能是戰前舊制高校中最強韌的。³⁶

以上利用目前所能網羅的資料，描繪日治時期臺北高校同窗會的概況，以下將針對戰後蕉葉會成立的背景加以探討。

參、戰後臺北高校蕉葉會成立之經緯

一、戰後初期臺北高校日籍師生的處境

1945年8月日本戰敗後，在臺灣的日本人約32萬餘人（不含軍人；軍人約22萬餘人，於1946年4月被遣返完畢）。據調查，其中約有14萬餘人，相當於44%願意留在臺灣。原因不難推想，蓋戰後初期的日本飽受戰時空襲的結果，滿目瘡痍，加以各種物資均欠缺的狀況下，生活不見得比在臺灣容易，且戰後的日本淪於被占領的狀態，從臺灣直接歸國未必是個好選擇。不過，大約1945年底或1946年初，有鑑於臺灣的情勢逐漸惡化，日本人不禁開始轉念，而放棄留在臺灣的想法。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日本人更無意願續留臺灣，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亦順勢遣返多數的日本人，除了二百餘位學者專家等獲准留用以外（連同家屬已少於千人），留用日本人的政策至此正式結束。³⁷在這種局勢複雜變化的期間，臺北高校日本人師生面對戰後復員、遣返回日等棘手的問題，無暇顧及同窗會組織。是故，同窗會的再建需要一段長時間。³⁸

³⁵ 山口房雄，〈略史〉，收入《わが青春・旧制高校》（東京：ノーベル書房，1977年），頁175。

³⁶ 邱永漢，〈台北高校のこと〉，收入《わが青春・旧制高校》，頁173。

³⁷ 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國史館學術集刊》，第3期（2003年9月），頁201-227；吳文星，〈戰後初年在臺日本人留用政策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5年6月），頁269-285。

³⁸ 山口房雄、富田敏郎，〈台北高等學校沿革〉，收入舊制高等學校資料保存會監修，《白

蕉葉會成立的前提，是日本人師生普遍有了較穩定的生活，尚且有熱心從事聯繫者付出努力，才有再建的契機及持續運作的能量。這又牽涉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教師們於戰後如何重新覓職；第二，受到戰爭影響而未完成學業的在學生之轉學問題。進而言之，該校的畢業生、戰爭結束時仍在學的學生，如何在戰後的日本社會占有一席之地？均是值得討論的課題。

考察第一個問題前，先介紹一段臺灣史學者曹永和的回憶。戰後初期臺北帝大總長安藤一雄原本希望該校可以移回日本國內，並請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盡力交涉。³⁹但這所舊制帝大並未在日本國內復校。曹永和在受訪時提及臺北帝大的學生「出路其實並不好，倒是帝大的許多老師回到日本後，都在大學繼續執教，像岩生成一老師先到東京大學，退休後再去法政大學、日本大學教書。法學教授中村哲，回日本後擔任過法政大學的總長，後來成為參議員」。⁴⁰又如桑田六郎教授返日後，在大阪大學任教。⁴¹然而，戰後的日本百廢待興，臺北帝大教授與臺北高校教授等人的再就職之路未必順遂。若以更廣的視角看待此一問題，包括臺北高校在內的高等教育相關機構之人才，於戰後日本的教育界、學術界、研究機構等的出路和表現，尚未見有系統的研究。曾久任臺灣總督府官僚的森田俊介，則為我們提供一條寶貴的線索。1946年返回日本的森田，為了使臺灣總督府的官吏、法界、教育界、警界等的人才能適得其所，於是與中央各官廳進行交涉。教育方面，他向文部省提出名簿，也將臺北帝大與臺北高校等各高專的教授名簿交給了文部省。⁴²至於結果如何，森田並未多加著墨。以下，本文僅先利用

線帽の青春 西日本篇》（東京：國書刊行會，1989年），頁276。

³⁹ 河原功編，《資料集 終戰直後の台湾》，第2卷（東京：不二出版，2015年），頁169-170。

⁴⁰ 補充說明的是，中村於1944年9月返回東京，因戰爭末期交通困難而無法回臺，就此留在日本。1946年2月，中村與榊田啓三郎（哲學者）偶然在路上相遇，經榊田的安排，中村擔任法政大學預科講師，同年就任法學部教授。參閱飯田泰三，〈中村哲先生の略歴〉，《沖繩文化研究》，第31號（2004年8月），頁249-250。

⁴¹ 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謝仕淵、謝奇鋒、蔡峙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年），頁87-88、90。岩生是臺北帝大南洋史學講座教授，桑田六郎是東洋史學講座教授，戰後初期都被留用一段期間。參閱周婉窈，〈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1928-1960）〉，《臺大歷史學報》，第61期（2018年6月），頁17-95。

⁴² 森田俊介，《內台五十年》（東京：伸共社，1979年），頁55-57。

大田周夫的資料就此略作探討。

大田於1928年3月自東京帝大法學部政治學科畢業，同年10月高等文官考試行政科及格，翌年6月進入臺灣總督府任職。⁴³ 戰後初期，大田任職文部省，他的個人文書中有一份〈引揚教職員名簿〉，收錄臺北帝大醫學部教授小田俊郎等共102人的名單。小田當時53歲，住在三重縣內，就職希望是「教育病院」。⁴⁴ 同樣是醫學部教授的森於菟，⁴⁵ 住在東京都大田區，就職希望不詳。臺北高校有3位教授名列其中，小山捨男（東京都世田谷區）與石本岩根（山梨縣）的就職希望為「高、專校」，另一位教授里井宥二良（京都市）的就職希望是「大學專門學校」。⁴⁶ 日後小田俊郎、森於菟之獲得新職，與其說是官廳協助的效果，不如說是既有的人脈關係發揮了作用，所累積的學術聲望為自己帶來新的機會。

臺北高校教師方面，也可見類似的模式。1946年返日的高峯一愚原為臺北

⁴³ 「大田周夫（任總督府屬；俸給；勤務）」（1929年6月1日），〈昭和四年四月至六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10221144X001。大田歷任府屬（營林所勤務）、專賣局參事、內務局土木課長等職。根據戰後總督府彙整的行政官名簿，可知大田累官至「州部長」（無更詳細資訊）。參見河原功編，《資料集 終戰直後の台湾》，第3卷（東京：不二出版，2015年），頁126。

⁴⁴ 戰後，小田俊郎獲聘留下任教臺大，1947年返日，先借住在鎌倉的友人處。他以前在北海道帝大醫學部的同事木下良順來訪，說明在美軍的援助下，大阪將設立新大學，邀請他前往任教。於是小田參與大阪市立醫科大學創立的籌備，歷任該校教授及大阪市立大學教授，1961年退休，並獲贈名譽教授稱號。小田以外，曾任教臺北帝大醫學部的教授有澤田平十郎、石井潔、細谷雄二等幾位教授。臺北高校畢業的木村英一（1936理乙），戰後曾擔任該校學長（即校長）。參閱以下資料：〈小田俊郎教授略歷〉，《小田俊郎教授開講十周年記念業績集》（大阪：大阪市立大學醫學部第一內科學教室，1958年）；〈小田俊郎名譽教授略歷〉，《小田俊郎教授業績集》（大阪：大阪市立大學醫學部第一內科教室，1965年）；小田俊郎，《続南船北馬》（私家版，1970年），頁155；小田俊郎，《むさしの春秋》（東京：日本醫事新報社，1980年），頁189；小田滋，《堀内・小田家三代百年の台湾——台湾の医事・衛生を軸として——》（東京：近代文藝社，2010年〈増補版〉），頁63-64。

⁴⁵ 森於菟1947年結束留用回到東京後，擔任帝國女子醫學專門學校教授（東邦大學前身）。戰前他擔任東京帝大助教授時，曾在該校講課；東邦大學創立者為其友人額田晉，因為額田的好意，於是任教該校。參見森於菟，《父親としての森鷗外》（東京：筑摩書房，1969年），頁328-330。

⁴⁶ 〈引揚教職員名簿〉，《大田周夫舊藏資料》，（東京，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教育圖書館藏）。

高校教授，同年擔任東京都立高等學校高等科講師，1948年成為該校教授，又隨著制度改變，1949年擔任東京都立大學講師，1963年升任教授。高峯任教該校，實因1930年代曾在府立高等學校代課一年半，當時認識他的老師還有幾位在校，而順利地獲聘。⁴⁷ 另外，齋藤齋被留用擔任臺灣大學副教授，1946年底返回日本後，也是在友人幫助下進入東京麻布高等學校任教。⁴⁸ 大田文書收錄的資料係1947年當時的情況，並非全部名單，惟從中亦可見部分曾任教臺北高校的教師之動向，例如島田謹二任教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前身）、犬養孝任教大阪高等學校（大阪大學前身）。⁴⁹ 要之，就常理推斷，如同小田俊郎、森於菟、高峯一愚，因為友人、同僚、師長之協助，而謀得教職的學者應不在少數。經過戰後初期混亂的情勢，臺北高校的部分教師返日後取得新職，持續作育英才，從事教學研究之餘，與在臺北教過的學生交流，成為安慰他們的幸福之一。

第二個要探討的問題，是臺北高校日本人畢業生、在學生於戰後的處境。隨著日本對外戰爭的擴大，正值壯年的臺北高校校友分布日本內外地及其勢力範圍，戰歿者不在少數。1950年代在日本發行的《愛光新聞》曾連載一系列介紹臺北高校出身者的文章，提及該校出身者因戰爭而喪生的約有近百位。⁵⁰ 執筆者「鷗亭」即是日治時期臺灣的新聞從業者大澤貞吉，戰後則是《愛光新聞》的編輯兼發行人。他的三位兒子畢業於臺北高校，女婿林金雄（日本人）也是該校畢業生（1931理甲）。⁵¹ 因此，大澤所寫的專欄對臺北高校研究，甚至是在臺日本人的際網絡，具有參考價值。臺北高校出身者戰歿人數，後來在蕉葉會的努力

⁴⁷ 高峰一愚口述、所澤潤訪問，〈聞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IX）・特別篇 台北帝国大学学生主事補、台北高等学校教授の体験を中心に〉，《群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編》，第53卷（2004年），頁60、85。

⁴⁸ 蔡錦堂、王麒銘，〈臺北高等學校的校長與教師群像〉，頁186。

⁴⁹ 〈台大教授、其ノ他轉職希望者調（第二回）〉，《大田周夫舊藏資料》，（日本）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教育圖書館藏。

⁵⁰ 〈人材を出した台北高校の思出〉，《愛光新聞》，橫濱，1955年4月1日，版4。

⁵¹ 林自尋常科念起，晚年曾回憶他的人生只經歷過這一次升學考試。就讀臺北帝大理農學部農藝化學科，畢業後留校擔任副手、助手，其後歷任附屬農林專門部教授、臺中高等農林學校教授、臺中農林專門學校教授。戰後，歷任岐阜農林專門學校教授、岐阜大學農學部教授；行政方面，曾擔任該校農學部部長、大學學長。參閱林金雄，《かかみの雜記》（岐阜：教育出版文化協會，1978年）。

下，可知其確切人數超過百人，計118人。⁵²

戰爭末期，美軍頻頻空襲日本，類似白井正（1940文乙）一樣，因為遭遇戰災而失去一切的校友，推想不在少數。⁵³ 此外，校友之中有的人於戰後被關入牢獄，暫時無法返回日本，⁵⁴ 甚至有人被蘇聯送至西伯利亞。⁵⁵ 他們經過一段時間後才能返國。另一方面，戰爭末期的畢業生，到了戰後也未必就能順利升學。⁵⁶ 再者，戰爭對臺北高校在校生之影響也相當巨大，以下擬討論他們離開臺灣後的部分去向。

有的人經過轉學後繼續升學，例如大原一三、吉見吉昭、豐澤弘毅等人。大原於1946年返回故鄉宮崎縣，後考取熊本五高及舊制第一高等學校文科，選擇進入後者就學；畢業後就讀東大法學部，走上官僚與從政之路，曾任眾議院議員、

⁵² 〈同窓生戰歿者名簿〉，《蕉葉會名簿（2005～2009年版）》（東京：蕉葉會，2004年）。藏本人司、德丸薩郎，《旧制台北高等学校戦没者名簿》（東京：臺北高等學校蕉葉會，2007年）。

⁵³ 白井正，〈蓬髪よサラバ〉，收入十五蕉葉會，《回顧・五十年》（出版地不詳：十五蕉葉會，1991年），頁74。白井（1921-2003），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1942年進入旭硝子（玻璃）任職；1945年4、5月遭遇戰災，喪失所有。戰後任職至1977年退休，之後轉入子公司東海工業擔任社長到1983年。感謝旭硝子前社長石津進也先生（1938-2021）提供相關資訊。

⁵⁴ 例如若杉治郎（1932文甲），任職臺灣總督府，擔任交通局書記、高等海員審判所書記。1942年受現地召集，成為預備少尉，任職花蓮港收容所，負責日本比島派遣軍從菲律賓送來的俘虜事務。戰後，被以戰犯身分起訴，關在香港的監獄；回日本後從事衣物製造販賣。參見「若杉治郎（臺灣總督府高等海員審判所書記ヲ命ス）」（1939年7月1日），〈昭和十四年六月至八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10098081X002；若杉治郎，〈だぶだぶズボン物語〉，《文藝春秋》，第34卷第3號（1956年3月），頁214-221；《蕉葉會名簿》（東京：蕉葉會，1958年），廣告頁。

⁵⁵ 例如中村裕（1931文乙），於戰前任職東洋生命、帝國生命、滿洲生命，終戰後被送至西伯利亞，1947年返國，任職興國人絹パルプ，1960年就任興國衛生材料社長。參見永田久光編，《ビジネスマンへの提言》（東京：大和書房，1963年），頁152；中村裕，〈旧制台北高校を偲んで〉，《實業之日本》，第67卷第8號（1964年4月），頁47。

⁵⁶ 例如，平間義隆（1945文乙）回憶，戰後他離開海軍後，沒錢也沒工作，也看不見未來，後因得知臺北一中的同學有幾位在京都大學求學，於是決定復學，以求有更好的前途，這已是1947年秋天的事。參見平間義隆，〈苦あれば樂あり〉，收入《大川市郎君追悼文集》（出版地不詳：日野原昌、丸本時雄發行，2005年），頁14-15。

農林水產大臣等職。⁵⁷ 吉見進入舊制松山高等學校，畢業後就讀舊制東京工業大學，再負笈美國取得博士學位，最後成為東京工業大學名譽教授。⁵⁸ 豐澤於1945年自臺北州立第一中學校（簡稱臺北一中）畢業後就讀臺北高校，隨即成為「學徒兵」，1946年受遣返後，先回父親的故鄉秋田縣，接著就讀青森的弘前高校、東北大學工學部，畢業後進入遞信省電子通信研究所、日立製作所、特許廳等任職。⁵⁹ 而在能夠繼續升學者之中，比較特殊的是以下所述轉入位在石川縣金澤的第四高等學校的臺北高校學生。

根據1945年入學臺北高校、日後成為著名法學者的園部逸夫之回憶，他入學同時即受到召集，戰後的短期間內修畢文科第一學年後，1946年4月擠在美國的貨物船中被送回日本，在廣島縣大竹港上岸，同年9月被編入四高一年級。⁶⁰ 園部回憶，有不少人轉學進入四高，四高之所以接納他們，可能是因為當時的校長烏山喜一（前京城帝國大學教授），能理解從海外被遣返學生的處境，因而讓不少人入學。⁶¹ 衡諸相關資料可知，園部以外，尚有船越宏洸、大和一夫、高野秀昭等人，⁶² 以及山田新一、橋本史郎。⁶³ 另外還有八田康雄，即著名的臺灣總督

⁵⁷ 大原一三，《「パンとサーカス」の時代》（東京：フォレスト出版株式會社，1999年），頁14-15；大原一三，《人間万事塞翁が馬》（宮崎：宮日文化情報センター，2005年），頁72-73。

⁵⁸ 吉見吉昭，〈台北高校の先生方〉，《臺高・師大通訊》，第3期（2021年5月），頁8-11。吉見另有個人網頁回顧往事，參見「吉見吉昭のホームページ」：<http://yoshimi-yoshiaki.la.coocan.jp/index.htm>（2021/6/4點閱）。

⁵⁹ 2017年12月9日，筆者參加在東京セントラルユースホステル（Central Youth Hostel）舉辦的「台北高等学校OBを囲む会」，主講人有川平朝清、園部逸夫、竹內昭太郎、田島覺、豐澤弘毅。主辦單位彙整一張5位先生的基本履歷分送現場參加者。

⁶⁰ 《台灣口述歷史研究》，第4集（東京：東京女子大學栗原研究室，2011年3月），頁21。

⁶¹ 園部逸夫，《旧制高等学校の栄光と残照》（出版地不詳：森下恭子發行，2013年），頁4。此為園部在「臺北高校創立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10月於臺師大）的演講紀錄；御厨貴編，《園部逸夫園部逸夫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タテ社会をヨコに生きて》（京都：法律文化社，2013年），頁26。至於學生們轉入四高的背後，是否有政府方面的政策決定，有待釐清。

⁶² 船越宏洸，〈高校生活の思い出〉，收入《しょうへい 蕉兵五十周年記念文集》（出版地不詳：蕉兵會，1996年），頁107-108。船越編入四高的理乙二年級，畢業後就讀名古屋大學醫學部。

⁶³ 竹內昭太郎，〈「後輩・名簿・旧高一体」〉，收入高橋潤子編，《メール&FAXによる「しょうへい会」第1回》（2020年6月），頁1。

府技師八田與一之子，他在編入四高後不幸去世。⁶⁴再根據筆者對伊藤圭典的口訪可知，伊藤自基隆中學畢業後就讀臺北高校，但1945年一入學即成為「學徒兵」。⁶⁵戰爭最末期的春夏，伊藤與師長及同學們在大屯山構築防禦工事，以防美軍登陸作戰，8月底下山，9月回校就讀，1946年與外祖母被遣返，之後獲得編入四高一年級，接著就讀京都大學工學部，畢業後進入東京電力工作。⁶⁶筆者更透過園部的介紹，寫信請教日下宗治。日下於1945年從臺北一中畢業後入學臺北高校，先在校內受訓，再移往草山一帶，從事應付美軍戰車登陸而緊急設施的防禦工程，以及練習如何爆破美軍戰車，直到戰爭結束才下山。⁶⁷戰後他編入金澤高校，後來與園部同樣就讀京都大學法學部。據日下的回函可知，四高尚有幾位臺高學生，以及來自臺北帝大預科轉入者數人。⁶⁸

有關臺北高校日本人學生在戰後初期的情形，最後必須一提的是，翻閱戰後發行的蕉葉會名簿，可以明顯發現1946年畢業生與仍在學者中，不少人的最高學歷空白。以辜寬敏同班同學為例，該班有27位學生，戰死者1人（池ヶ谷俊男）、死亡者1人（山之內淳之裕）、消息不明者1人（田中稔），其餘24人之中有10人未繼續升學。⁶⁹他們有的回日本後即進入職場工作，例如竹下太郎、⁷⁰

⁶⁴ 津田勤子，《戰時下台湾の高等学校生と文芸》，頁116。

⁶⁵ 伊藤的父親伊藤儀是山形縣新庄人，東京帝大經濟學部畢業，曾任職「中支那（即中國大陸華中地區）振興株式會社」所經營的「華中都市自動車株式會社」。母親岸田勝見，原籍廣島縣，岸田家在基隆經營吳服店，勝見於1900年代在基隆哨頭出生，從廣島的女學校畢業後，與伊藤相親結婚。1928年在東京慶應病院出生的伊藤圭典，小學高年級時來到基隆，受外祖母照顧；母親則在日本養育伊藤的弟妹（2017年8月11日，於橫濱市南區伊藤家訪問）。

⁶⁶ 伊藤圭典，〈学徒隊の終わり〉，收入臺灣協會編，《台灣引揚史》（東京：臺灣協會，1982年），頁29-32；筆者對伊藤的口訪。

⁶⁷ 日下宗治，〈マラリアと"心臟移動症"—昭和二十年の「わが闘争」—〉，收入《台北高等学校》，頁369-378；日下宗治，〈十六歳の陸軍二等兵〉，收入福山琢磨編，《孫たちへの証言》，第6集（大阪：新風書房，1993年），頁100-103。

⁶⁸ 日下宗治致筆者信函（2017年8月24日、2018年1月4日），手稿。從臺北高校轉入四高者，除了上述的園部、船越、大和、高野、八田、伊藤、日下以外，尚有青山善次、井手（舊姓酒井）孟雄、梶塚千里、佐佐波昭二、筒井實、伊藤博之、江里口謙一、御竿昭二、塚原登、浦田昭典、山田新一。日下先生提供的名單記於此，有待查閱該校資料。

⁶⁹ 他們是：伊奈山信義、大森敏生、崎津進、高木十之祐、高田文武、竹下太郎、富瀬利久、仲田輝男、野崎雅和、村上迅。

⁷⁰ 竹下於1927年在臺北市出生，1946年離開臺灣前往日本，先後任職旭交易會社、三菱商事

村上迅。⁷¹ 該屆因為家境等因素，提早踏入社會而未能再升學者，應該還有不少。⁷² 如前所述，年輕的菁英學子只要考進高校，接下來直到大學畢業幾乎不必再為升學考試煩惱，然而在時代巨變的衝擊下，他們不得不提早投入職場，臺北高校是他們最後的學歷（含肄業者）。在重視學歷的社會，可想而知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無法施展抱負，過得不如意與充滿沮喪感。儘管沒有大學文憑，他們在戰後日本社會中好不容易安頓之後，應該與諸多校友一樣，期待參加蕉葉會與師長及校友們交流。

二、蕉葉會的出現與正式成立過程

究竟蕉葉會的名稱何時開始使用？戰後第一次的蕉葉會於1950年4月在東京大學農學部舉辦，參加者包括：佐藤利廣（1928文甲）、霜三雄（1929理乙）、松本巖（1930文甲）、吉田道明（1929理乙）、大越伸（1929理甲）等12人。⁷³ 臺北高校前幾屆的畢業生大約是1910年前後出生，當日本戰敗時年紀不過30多歲。隨著日本經濟復甦、邁向高度成長，他們憑藉本身優異的資質、學養、外語能力及豐沛的人脈，得以在日本社會站穩腳步，而在忙碌的工作之餘，同窗會的再建，成為他們共同的冀望。

就管見所及，1950年即有蕉葉會的名簿編製完成，此或可佐證當時臺北高校校友已使用蕉葉會之名，作為凝聚的象徵。⁷⁴ 該名簿收錄2,807人，其中1,500人的消息可以掌握，就日本人的部分而言，已有7成的師生能聯繫得上。由於戰後

會社，直到1985年從三菱商事退職。他精通外文，擅長翻譯，曾以筆名竹下流彩出版俳句作品集。參閱竹下流彩，《句集 続 港》（東京：角川書店，1992年），頁268-269；竹下流彩，《隨想 港》（東京：角川書店，2008年），作者介紹頁。

⁷¹ 村上迅於戰後回父親的故鄉大分縣，雖轉入位在鹿兒島的第七高等學校，因經濟狀況差，隨父母親務農，一度因病瀕於垂死狀態而無法完成學業；其後擔任中學校教師，曾任中學校長，直到1986年退休。參閱村上迅，〈台高の戦中戦後〉，《さあれ七星の学び舎に》（出版地不詳：舊制臺北高校昭和十九年入學文科生，1999年），頁84-85。

⁷² 例如，津田勤子曾訪問東敏男，他是齒科醫師東熙市之子，因1945年父親去世，敏男返日後為了扶養家人而放棄升學，先在神戶的美軍基地擔任通譯等，後來終於找到高校生物教師的工作。參見津田勤子，《戰時下台湾の高等学校生と文芸》，頁116。

⁷³ 〈会員だより〉，《蕉葉会会報》，第26號（1973年4月），頁3。

⁷⁴ 筆者收藏的該年名簿，由於版權頁等脫落，無法得知編輯的經過。

初期日本的客觀環境不佳，編輯的負擔與辛勞可想而知；儘管其內容完整度、正確度都不夠精確，但見證了日本方面臺北高校校友組織的再出發。1950年代初期以降，各種以蕉葉會為名的聚會活動漸次展開，其動態不時刊登在《愛光新聞》等資料。根據1950年代後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相關報導，其概況可勾勒如下。

在東京地區，臺北高校校友於奇數月15日相聚，聯絡人為前言提及的山口政治。⁷⁵到了1960年代，在東京有所謂「丸ノ内蕉葉會」，校友於每月第一個星期六相聚，若遇休假日則順延一周。⁷⁶此外，也有以同屆為名義的聚會活動。⁷⁷同屆校友有時為了紀念畢業滿幾週年，相約舉辦活動。例如，1932年畢業的校友，於畢業滿30週年的1962年，文理兩類共同在伊豆修善寺的溫泉飯店相聚，出席的師長包括已經從熊本大學退休、轉居東京都八王子市的瀨邊惠鎧，⁷⁸以及富田義介、嶺脇四郎。到了該屆畢業滿35週年的1967年，在東京的中野舉辦懇親活動，並約好下次滿40週年時，由塩澤喜彥主辦，地點在沼津。⁷⁹再者，若有同窗從外地來到東京，⁸⁰或是昔日恩師從外地來到東京時，歡迎會之類的活動更是不定期召開。⁸¹

相對地，東京的臺北高校校友到外縣市時，當地的校友臨時舉行歡迎會，以

⁷⁵ 〈蕉葉會定例集會〉，《愛光新聞》，橫濱，1955年11月，版4。

⁷⁶ 〈集り〉，《蕉葉會會報》，第3號（1961年6月），頁11。

⁷⁷ 例如，1955年11月，1943年度畢業生十多人在東京日礦俱樂部聚會。參見〈台高同期會〉，《愛光新聞》，橫濱，1955年12月，版4。推測可能是任職日本礦業的石井恭平（文乙）所安排。

⁷⁸ 瀨邊專攻化學、藥理學，1926年任教臺北高校，1944年成為臺北帝大教授，戰後曾獲臺大留用。1948年任教熊本醫科大學，1952年任教熊本大學至1961年退休。有關其生平參見歐素瑛，〈臺北高校與臺北帝大知識與人脈的流動：以瀨邊惠鎧為中心〉，《臺灣文獻》，第69卷第4期（2018年12月），頁249-276。

⁷⁹ 〈卒業してから三十五年〉，《台灣協會報》，第158號，1967年11月，版4；《瀨邊惠鎧先生的回想》（東京：瀨邊先生記念出版會，1981年），頁69。

⁸⁰ 例如，1960年4月，任教神戶商船大學的分島拓（1928理乙）上京時，以第一屆畢業生為主在新宿聚會，參加者包括秋永肇（明治大學教授）等十餘人。參見〈蕉葉會の小集〉，《愛光新聞》，橫濱，1960年5月，版4。

⁸¹ 例如，1966年5月，杉原季義（教授軍事教練、武道）上京時，臺北高校劍道部成員在新宿相聚（師生共26人）。參見〈杉原先生歡迎會〉，《台灣協會報》，第141號，1966年6月，版3。

敘舊誼。⁸² 在東京以外，各地經常有蕉葉會相關的活動。例如，長崎縣的蕉葉會由該縣的水產試驗場技師諸岡等（1930理乙）負責，該縣的水產部水產課技師永山三平（1945入校）從旁協助。⁸³ 今村博之（1932理乙）曾回憶，戰後瀨邊惠鎧教授任教熊本大學醫學部，有兩次來到長崎時，住在長崎的校友舉辦歡迎會，迎接昔日臺北高校的老師。⁸⁴ 廣島地區也有蕉葉會，每年聚會4或5次，約有10到20名出席。⁸⁵ 此外，宮城縣、名古屋也可見校友活動的身影。⁸⁶ 在沒有新幹線（1964年開始營運）的年代，師生要見上一面可說頗不容易。舉例而言，1955年左右在鹿兒島經營事業的大內田敏行（1939理甲），從當山堅三（1936理甲）得知熊本蕉葉會要招待荒川重理教授，大內田為了拜見已有十五年未曾謀面的老師，於是坐車五個小時專程到熊本赴會，其內心的喜悅難以言喻。當晚荒川留他同宿，師生促膝長談，這也是他們最後一次相見。⁸⁷ 要之，戰後經過十餘年，分布日本各地的臺北高校校友不時舉辦聚會，藉以聯絡感情，凡此都為同窗會的再建與發展奠基。

關於蕉葉會成立的時間，根據德丸薩郎（1944文甲）回顧，該會成形於1960年夏天，當時盡力付出的校友包括三井明（1929文甲）、鹿沼彰（1930理乙）、藏本人司（1942年9月文甲）等人。⁸⁸ 1961年5月，蕉葉會召開總會，約有120人參加，鉅鹿義明（1928文甲）被選為首任會長。鉅鹿是臺北高校第一屆畢業生，1931年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曾任臺灣總督府法院判官。⁸⁹ 他就任會長時，正擔

⁸² 例如，1961年9月，宮瀨洋一（1944文乙，東京地裁判事）與岩川守良（1944文甲，東京製靴社長）前往九州出差，除了到大分市拜訪山口政治（當時從中央調任大分縣中小企業課長），也到別府拜訪荒川重理（別府大學教授）。參見〈恩師囲んで蕉葉会員の懐旧談〉，《愛光新聞》，橫濱，1961年11月，版4。

⁸³ 〈あの人この人6〉，《愛光新聞》，橫濱，1955年8月，版4。

⁸⁴ 參見《瀨邊惠鎧先生の回想》，頁66。

⁸⁵ 〈広島蕉葉会〉，《愛光新聞》，橫濱，1955年8月，版4。

⁸⁶ 〈あの人この人12〉，《愛光新聞》，橫濱，1956年5月，版4。該資料列出宮城縣蕉葉會的參加者，以及轉任外地而離開者的名單。〈あの人この人16〉，《愛光新聞》，橫濱，1956年11月，版4。名古屋的臺高同窗會，由桑山脩助（1943文乙）負責聯繫。

⁸⁷ 《荒川重理先生の思い出》（出版地不詳：荒川先生の會，1977年），頁112。

⁸⁸ 〈蔵本蕉葉会会長の逝去を悼む〉，《台湾協会報》，第729號，2015年6月，版4。

⁸⁹ 鉅鹿於1933年10月擔任法院判官，1940年9月轉任判事。參見「鉅鹿義明（在職中事務格別勉勵ニ付金；頭書額二百五円ヲ賞與ス）」（1940年9月1日），〈昭和十五年

任東京地方裁判所判事。在鉅鹿會長之下，岡野一郎（1932理甲）等人擔任常任幹事，事務所設在山口房雄位於東京都杉並區的家。附帶一提的是，蕉葉會於2003年出版的《獅子頭山讃歌：自治と自由の鐘が鳴る》，附錄一份年表，記載首任會長為吉村邦壽，內容有誤。⁹⁰

由上可見，蕉葉會早於1950年前後即已存在，惟嚴格來說，經過總會選出會長，向會員收取會費（日幣500圓，其後調漲），且有組織性的發展，則是1961年以後。1963年5月的蕉葉會總會上，鉅鹿會長因健康不佳，由同樣是臺北高校第一屆文甲畢業的清水護接任會長。⁹¹ 1965年清水會長的任期滿了，還是由同班同學吉村邦壽接任會長。⁹² 鉅鹿與清水則擔任該會顧問。蕉葉會的前三任會長，都是由臺北高校首屆畢業生出任。如下節所述，蕉葉會在吉村會長任內，活動更趨熱絡。

肆、蕉葉會的活動及校史的出版

一、蕉葉會員的活動與日臺校友的交流

臺北高校的日本人校友，在遠離母校的東京組織蕉葉會，並在各地設立支

九月至十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10107035X002。鉅鹿的父親鉅鹿赫太郎為日治時期知名的通譯，筆者曾寫信請教義明的兒子直賢，是否有祖父與父親的資料，其表示印象中只有關於鉅鹿家歷史來歷的資料（2012年6月來函）。

⁹⁰ 《蕉葉会会報》，第1號（1961年5月），無頁碼；〈蕉葉会に会長〉，《愛光新聞》，橫濱，1961年11月，版4。山口房雄編，《獅子頭山讃歌：自治と自由の鐘が鳴る》（東京：舊制臺北高等學校記念文集刊行委員會，2003年）。

⁹¹ 清水護（1908-2012）畢業於東京帝大文學部，為著名的英語教育學者，其履歷與著作目錄參見《回顧即感謝 清水護先生百歲記念誌》（東京：清水護先生百歲記念誌刊行會，2008年），頁1-7。又其父親清水源次郎自明治時代即任職臺灣警界。有關其家族的故事參閱清水護編，《台湾に生きた清水源次郎を偲ぶ》（東京：編者發行，2003年）。

⁹² 《蕉葉会会報》，第9號（1965年6月），頁2；清水護，〈臺北高等学校創立四十周年記念日の挨拶〉，《蕉薈集》（東京：蕉葉會，1966年），頁6-12。臺北高校畢業生為紀念校長三澤糾（1878-1942）逝世25年而編集此小冊。

部。綜合該會的會報等相關資料，主要會務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出版方面，蕉葉會承繼戰前臺北高校同窗會的傳統，持續發行名簿和會報。前已述及，1950年即有蕉葉會名簿問世。不過，蕉葉會的名簿並非每年發行。這是因為編輯者在正職以外，必須費時整理會員們寄來的明信片、匯款通知等，加以財源不足等因素，導致名簿編輯的進度緩慢。例如，1956年的蕉葉會名簿距上回發行拖延將近四年，負責的人為此事特向會員們致歉，也不忘呼籲會員記得匯款（當時為日幣200圓），而對教職員、戰歿者遺族則是免費致贈。編者也自我期許，今後的目標是努力將臺灣人校友的消息補齊及更新。⁹³ 1958年的名簿新增廣告頁，以充裕蕉葉會的財政。⁹⁴ 又自1966年版的名簿開始，名簿的作業於總會召開之後進行，以求內容更加確實。⁹⁵ 蕉葉會名簿的編製是亟需細心與耐煩的工作，儘管未必能如期完成，情況不明的校友仍舊長期存在，惟毋庸置疑，名簿是師生互相聯絡最重要的資訊。是故，編輯者力求網羅校友們正確的消息，遇有會員異動或轉勤、資訊錯誤時即予以訂正。同時，該會自1961年5月起持續發行《蕉葉會會報》，向會員報告會務、相關人事動態，以及令人悲傷的訃聞。由會報所載內容亦可知，蕉葉會對年屆古稀的恩師致贈禮物，對需要協助者加以援助，對獲獎、受賞的師生給予祝賀。

其次，在大型活動方面，蕉葉會定期舉辦新春互禮會（即新年會，1月舉辦）和總會（5月舉辦），地點選擇在東京的虎ノ門的共濟會館，或是丸ノ內的東京會館。席間，司儀常會按照畢業年度介紹參加者，藉此拉近學長與學弟之間、或是同屆不同科的同級生之距離，有時亦可見臺灣人校友參加新年會或總會。這些動態刊登在臺灣協會發行的《臺灣協會報》，使不克前來參加的校友亦可得知蕉葉會的近況。⁹⁶

⁹³ 〈あとがき〉，《蕉葉会名簿》（東京：蕉葉會，1956年），頁87。

⁹⁴ 〈あとがき〉，《蕉葉会名簿》（1958年），未編頁碼。刊登廣告費為全頁4千圓，半頁2千圓，四分之一頁1千圓。

⁹⁵ 〈あとがき〉，《蕉葉会名簿》（1966年），頁142。

⁹⁶ 臺灣協會是戰後初期從臺灣回國的日本人所成立最具代表性的組織。關於該協會參見鍾淑敏，〈戰後日本臺灣協會的重建〉，收入許雪姬編，《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年），頁69-121。

1965年吉村邦壽繼清水護之後接任會長，同年5月的總會在虎ノ門的共濟會館盛大地舉辦。出席師長有已故校長三澤糾的夫人，以及教職員伊藤慎吾、石本岩根、楠基道、齋藤齋、瀨邊惠鎧、高峯一愚、中野賢作、平澤平三；與臺灣總督府有關者有第十八任總督長谷川清（唯一在世的總督）、後藤文夫（前總督府總務長官）、石井光次郎、深川繁治、梁井淳二、森田俊介（均為前總督府高等官僚）。屬於友校代表，則有臺北醫專南溟會會長岩瀨祐一、臺北高商綠水會會長石橋余吉、臺北高農榕畔會會長手島龍雄。上述嘉賓加上蕉葉會會員179人，總共約有200人出席。會上特別對三位會員夫人致贈感謝狀與紀念品，她們是山口喜美子、藏本千惠子、安達康子。可知山口房雄、藏本人司、安達正（1945文甲）對會務的貢獻，極仰賴「內助之功」。大會也安排專人進行報告，他們是日本駐馬來西亞大使甲斐文比古（1930文乙）、任職沖繩琉球銀行的稻泉薰（1945文甲）、任職「琉球放送」的川平朝清（1946理乙）。甲斐於1933年自東京帝大畢業後進入外務省，是臺北高校出身、活躍於官界的超級菁英。⁹⁷ 稻泉於1948年自京都大學畢業，是知名的沖繩經濟研究專家，1954年擔任琉球大學教授，1960年進入琉球銀行任職，是該行調查部的核心人物。⁹⁸ 川平於戰後離開臺灣，前往父母的故鄉沖繩，其後於1953年留學美國。1965年當時，川平正忙於「沖繩放送協會」的創業。⁹⁹ 從他們的經歷推察，應該是從外交、經濟、媒體等觀點與校

⁹⁷ 甲斐文比古在戰後曾三度奉派德國，1955至1958年擔任柏林總領事、漢堡總領事，1970至1972年擔任駐西德大使。1970年2月，蕉葉會成員為甲斐夫婦舉辦歡送會，場地在皇居前的パレスホテル（Palace Hotel，同屆校友北村周三擔任高層），有80餘人參加，同班同學檜橋豐市特地從長崎前來赴會。他的外交官生涯至1973年退休為止。參見〈甲斐駐獨大使祝賀並びに歓送会開催〉，《台灣協會報》，第187號（1970年4月），版3；甲斐文比古，《国境を越えた友情》（東京：東京新聞出版局，1990年），頁45-46、197-198、版權頁之作者介紹。

⁹⁸ 稻泉薰在1981年轉任該行常任監查役，之後擔任琉球信用保證サービス（service）的社長、會長。著作（含編著）主要有：《琉球銀行十年史》（1962年）、《沖繩經濟への提言》（1966年）、《沖繩の伝統産業》（1979年）等。其對沖繩經濟的貢獻與見解，參見稻泉薰，〈沖繩經濟と共に～「20年蕉葉会」の50周年によせて～〉，收入二十年蕉葉會編，《ペガサス20 卒業五十周年記念》（出版地不詳：二十年蕉葉會，1995年），頁10-15。

⁹⁹ ジョージ・H・カー著，蕭成美譯，川平朝清監修，《裏切られた台湾》（東京：同時代社，2006年），頁566、版權頁；〈『裏切られた台湾』に込められた思い——「湾生」・川平朝清さんに聞く〉，收入：「Nippon.com」：<https://www.nippon.com/ja/people/>

友分享見解。參加這次盛會的臺灣人校友則有7人，包括許炎亭（1930文甲）、張有忠（1938文乙）、張雲舫（1940文甲）、王育德（1942年9月文甲）、邱永漢、林榮陞（1943文甲）、林宗毅（1944文甲）。¹⁰⁰ 1965年另一件大事，則是臺灣人校友舉辦同學會大會時，蕉葉會有10餘人前往臺灣共襄盛舉。¹⁰¹ 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資料是，1967年的新年會在共濟會館舉行，有80多人參加，現場展示長谷川光雄（1931文乙）拍攝的臺灣風景寫真作品，以及展示前一年（1966）「第6回日本寮歌祭」（詳後）的照片。¹⁰²

在日本的臺北高校臺灣人校友雖然不多，他們也積極參加蕉葉會的活動。以王育德為例，他於1949年赴日後再入東京大學深造，1960年起推展臺灣獨立運動之後，時而參加同屆同學的聚會與蕉葉會。¹⁰³ 王育德是1942年9月從臺北高校畢業，這一屆文科與理科的畢業生定期於每年2、4、10月第三個星期三在東京聚會，負責人是藏本人司。¹⁰⁴ 其次關於蕉葉會活動之參與，例如1965年1月16日上午，他參加在共濟會館舉辦的新年會（約70人參與），會上因前會長鉅鹿的好意，而有機會針對臺灣與日中關係談論約10分鐘，他把握機會進行演說，希望大家努力讓日本人傾聽臺灣人的意見。在這次的新年會上，他也認識了清水會長，又從山口房雄處聽取有關社會黨內部的情形；下午5點散會後，又與神田信夫（1941文乙，知名東洋史學者）到店裡談論政治議題。¹⁰⁵ 同年5月參加上述的蕉葉會總會。此外，他也曾參加其他年度的新年會和總會，例如1972年1月20日傍晚，他與同屆的朝田秀作、藏本人司、吉江清景、川崎寬治、木下和之、豐日

e00094/?pnum=1（2021/2/28點閱）。

¹⁰⁰ 〈200名出席の大盛會〉，《蕉葉会会報》，第9號（1965年6月），頁1；〈思い出の蕉葉〉，《台湾協會報》，第129號，1965年6月，版3。

¹⁰¹ 〈台北の同学会大会〉，《蕉葉会会報》，第9號（1965年6月），頁4。

¹⁰² 〈蕉葉会（新年互礼会）〉，《台湾協會報》，第149號，1967年2月，版2。

¹⁰³ 有關戰後王育德的事蹟，參見王育德著，近藤明理編，《「昭和」を生きた台湾青年：日本に亡命した台湾独立運動者の回想1924-1949》（東京：草思社，2011年），頁294-325。

¹⁰⁴ 長崎明，〈わが道を求めて（最終回）〉，《にいがたの教育情報》，第29號（1991年7月），頁93。

¹⁰⁵ 〈蕉葉会の新年互礼会〉，《台湾協會報》，第125號，1965年2月，版5；〈王育德先生日記〉，1965年1月16日。該日記由王育德次女王明理女士提供原稿影像檔，謹致由衷的謝意。

英一出席新年會，聽取佐伯喜一（1933文乙，野村總合研究所社長兼所長）談有關日本及美國的對臺政策。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張漢裕（1934文甲）、林金生（1936文甲）也參加了此次的新年會，王育德與他們交換名片，並從張氏談話中聽到有關臺灣人的想法，覺得有參考價值。¹⁰⁶ 又如同年5月21日，蕉葉會召開臺北高校創立50週年紀念總會，他也參加該會。¹⁰⁷ 王育德在日本從事臺灣獨立運動，以及1974年底以後為臺籍日本兵補償運動奮鬥時，得到校友們的共鳴與協助，實與平日和校友保持聯繫有密切的關係。¹⁰⁸

而在小型活動方面，除了一般聚會、歡迎地方校友上京的聚會、或打高爾夫球等以外，由藝術同好者所舉辦的「蕉葉展」，經常吸引校友前往參觀。此外，每當有校友的好消息傳來，蕉葉會即為之舉辦祝賀會。此一時期，臺北高校的校友正值人生巔峰（約40至60多歲），在日本社會各領域成為中堅世代，甚至位居領導階層。尤其，卓有成就者逐漸輩出，讓校友們引以為榮，試舉三例說明。例如，1965年中原武夫（1933文乙）擔任日本國會的參議院社會勞動委員會專門委員，以及吉岡英一（1935文乙）擔任國稅廳長官，蕉葉會成員為了慶祝這兩件人事，4月在糖業會館（位於東京都有樂町）聚會，出席者計有135名之多，動員人數相當於總會的規模，可見會員們對此事何等重視。¹⁰⁹ 又如，同樣是在1965年，物理學者、時任大阪市立大學教授的三宅三郎（1942年9月理甲，舊姓渡

¹⁰⁶ 〈蕉葉會新年互礼會〉，《台灣協會報》，第209號，1972年2月，版2；〈王育德先生日記〉，1972年1月20日。

¹⁰⁷ 〈台北高等学校創立五十周年記念總會（蕉葉會）〉，《台灣協會報》，第214號，1972年7月，版1；〈王育德先生日記〉，1972年5月21日。

¹⁰⁸ 1974年底「中村輝夫」在印尼摩羅泰島被發現後，王號召各界為「臺灣人元日本兵」（通稱臺籍日本兵）爭取權益；由於臺日已無邦交關係，補償問題面臨各種困難，即使採取法律訴訟也連續失敗，卻讓日本各界認識該問題的嚴肅性，終於促使國會立法發放弔慰金。最初王成立「中村輝夫先生暖心歡迎會」，蕉葉會的大越伸會長曾致函會員們請求提供協助。參見陳鈺琪，〈王育德與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年），頁25。又，臺高校友對思考會的支持，從思考會的捐款亦可獲得證實。王收到捐款後將金額公布在會報上，可見三井明、大越伸、山口房雄、神田信夫、同屆的內藤良、鶴田彬與平坂重雄、及山口政治等人捐款。參見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編，《台灣·補償·痛恨：台灣人元日本兵戰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東京：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1993年）。

¹⁰⁹ 〈吉岡（國稅長官）、中原（參議院專門委員）兩氏の榮進祝賀〉，《台灣協會報》，第127號（1965年4月），版5。

邊），獲頒「仁科記念賞」（1955年創設，用以紀念有日本現代物理學之父稱號的仁科芳雄），12月在他領獎前，劍道部成員在東京郊外聚會時，三宅也趕赴會場，懇親會變成了祝賀會，慶祝他獲得這項殊榮。¹¹⁰再如1967年3月，蕉葉會員在銀座祝賀川崎寬治（1942年9月文乙）當選國會議員，共有36人參加，吉村會長也出席該次聚會。¹¹¹

在各種大小活動以外，蕉葉會會員也參與著名的寮歌祭。寮即宿舍之意，臺北高校的學生寮名為「七星寮」。學寮的年度盛事為舉辦「寮祭」慶祝活動，由學生等人所創的「寮歌」相當受到重視。前引《獅子頭山讚歌》所附錄的年表記載，1961年10月蕉葉會參加第一回日本寮歌祭（在文京公會堂舉辦，由舊制高校畢業生代表演出各校學寮之歌）。參加者之一的富田敏郎（1945文乙）曾回憶，臺北高校參加此回寮歌祭的人雖然屈指可數，但他們高唱臺北高校的第一校歌「獅子頭山」。¹¹²蕉葉會對寮歌祭相當重視，不僅可以在此重現母校的特色，也能與他校進行交流。參加者慎重其事，在出場前加緊練習準備，以求有更好的表現。例如，1963年10月第三回日本寮歌祭前，先在臺灣協會大樓內預演；臺北高校校友在該回寮歌祭登場演出者，包括東大農學部教授大越伸等20餘人，大放異彩，博得好評。¹¹³再以1966年第六回寮歌祭（在日比谷公會堂）為例，蕉葉會

¹¹⁰ 〈台高出身三宅三郎博士原子核研究で仁科記念賞〉，《台湾協會報》，第135號（1965年12月），版2。歷來獲頒仁科記念賞的研究者之中，有3位曾就讀臺北高校，一是1957年的久保亮五（東京大學理學部教授），曾就讀尋常科，父親是臺北帝大教授久保得二（號天隨）。第二位是1965年的三宅，第三位是1966年的小田稔（東京大學宇宙航空研究所教授，父親是小田俊郎）。

¹¹¹ 〈蕉葉会の有志が川崎代議士を激励〉，《台湾協會報》，第151號，1967年4月，版5。

¹¹² 山口房雄編集，《獅子頭山讚歌：自治と自由の鐘が鳴る》，頁171頁。富田在山口政治（七星寮室長）的呼引之下，參加第一回寮歌祭。後來蕉葉會參加該活動者成長至數十人之多。參見富田敏郎，〈寮歌祭と私〉，收入二十年蕉葉會編，《ペガサス20 卒業四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地不詳：二十年蕉葉會，1990年），24-25。富田記得第一回只有6、7人參加，岡野一郎的記述則是約20多名，當時在羽室亨（1930理甲）的協助下，曾借用大妻女子大學的講堂進行練習。參見〈寮歌祭をめぐる〉，《蕉葉會會報》，第11號（1966年1月），頁4。

¹¹³ 〈蕉葉会が寮歌祭に出場〉，《台湾協會報》，第110號，1963年11月，版4。日本寮歌祭自1960年代舉辦，直到2010年第五十屆畫下休止符。其後有關舊制高校等的寮歌活動，則由日本寮歌振興會舉辦「寮歌伝承の集い」，事務局設在本文介紹的伊藤圭典自家。相關報導參見〈旧制高校寮歌を後世に〉，《北国新聞》，2015年1月3日，版45。

成員先在同年5月的總會上，預演給眾人欣賞。等到11月參加寮歌祭時，在總共47校參加、超過7千人的會場，蕉葉會有60餘人登場，他們圍繞著模型做成的盛開香蕉樹，配合著山口房雄吹奏的豎笛旋律，大跳「臺高踊」（臺高舞），甚至跳到脫去上衣、熱力四射地表演，更對觀眾席拋送香蕉，贏得滿堂喝采，充分展現臺灣特色，使臺下觀眾看得津津有味。¹¹⁴除了日本寮歌祭以外，蕉葉會成員也參加關西寮歌祭。¹¹⁵

小型活動還有一項值得留意，即臺灣人校友訪日時常受到蕉葉會成員的歡迎。如所周知，1950年代前期日本與臺灣因為國際政治關係使然，政治方面「日華外交」重新開啟；經濟方面，「日臺關係」也在通商關係重建後陸續往來。前者在政府高層的指示下進行，後者則可見臺灣與日本之間既有的人脈、商貿網絡等發揮作用。¹¹⁶在這種新局面下，日治時期畢業於臺灣及日本國內高校並完成大學教育的臺灣人菁英，不僅擁有精湛的日語能力，在與日本人交流時，雙方在各自國家中的地位堪稱相當，較易建立信賴關係。這些臺灣人菁英無論是主動或被動參與對日事務，在「日華外交」及「日臺關係」同步發展出來的空間裡，較有機會扮演一定的角色，自不待多言。

概言之，此一時期大致有醫界的魏火曜（1929理乙，臺大醫學院長）、陳萬裕（1939理甲，臺大醫學院教授）、陳萬益（1945理乙，瘡疾研究所長），以及劉闊才、徐慶鐘、許建裕（1930文甲，任職農復會）、¹¹⁷黃榮華（1932理乙，

¹¹⁴ 〈蕉葉会總會記〉，《台灣協會報》，第143號，1966年8月，版6；〈寮歌祭に台大予・台高出場〉，《台灣協會報》，第146號，1966年11月，版3。

¹¹⁵ 〈関西寮歌祭盛大に行わる〉，《蕉葉会會報》，第13號（1966年10月），頁5。1966年5月在大阪中之島中央公會堂舉辦，蕉葉會有44人參加。

¹¹⁶ 關於1950年代以降至斷交前的日臺關係，可參閱川島真等著，《日台關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頁39-94。

¹¹⁷ 許建裕，臺北州立第二中學校（簡稱臺北二中，今成功高中）、臺北高校、京都帝大法科畢業，曾在滿洲國中央銀行任職，戰後在農復會任職，後來擔任世界銀行顧問、臺北市銀行常董等職。參閱莊健隆，《臺南莊黃兩個家族——莊維藩與黃京華的故事》（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20年），頁304-305。

農林廳）、¹¹⁸ 羅啟源（1933理甲，土地銀行）、¹¹⁹ 辜振甫（1937文甲，臺灣水泥公司）、林挺生（1939理甲，大同公司）、吳建堂（1944理乙，醫師、劍道高手、俳句作家，筆名孤蓬萬里）、潘貫（1930理甲，臺大教授）、周百鍊、賴順生（1930文甲）、林金生等人，訪日時與蕉葉會成員有所互動。

在本文研究的時期內，徐慶鐘和劉闊才常訪問日本。以徐慶鐘為例，根據阮毅成的〈中央工作日記〉可知，1962年6月，徐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副秘書長，在報告其2月赴日工作之經過時，提及此行主要目的在於勸阻留日學生，參加廖文毅等人紀念二二八之活動，在日期間他與王育德見面3次，「一次係在北高同學歡迎會，二次係王來旅舍，告以國民團結合作之必要，並指斥所了解之臺灣，與事實不符，期其能有所轉變。」¹²⁰ 引文中的「北高同學歡迎會」，指的就是蕉葉會歡迎徐的聚會。又如1965年12月，徐赴日參加「日華協力委員會」（中日合作策進會），¹²¹ 蕉葉會有18人到銀座與他相聚，其中3位是在日臺灣人校友，即許炎亭、林宗毅、辜寬敏。¹²² 再如1968年9月，蕉葉會成員接

¹¹⁸ 根據1945年12月「臺灣問題研究所各種資料研究人員略歷表」，黃榮華為臺北人，臺北帝大理農學部農學科畢業，曾在臺灣總督府殖產局任職。參見許雪姬編，《臺灣重建協會與二二八事件文書》，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7年），頁870。他何時前往中國，在上海的活動情形，以及戰後的經歷（農林廳副廳長等）有待探討。

¹¹⁹ 羅啟源，新竹人，臺北一中、臺北高校、臺北帝大理農學部畢業，為農經專家，戰後曾任臺灣省農林廳副廳長、土地銀行副總經理、臺北市政府建設局長、臺北市銀行董事兼總經理。1974年去世。參見羅啟源治喪委員會編，《羅啟源先生紀念集》（出版項不詳，1974年）。

¹²⁰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二十五）〉，《傳記文學》，第91卷第3期（2007年9月），頁131-132。阮於1961至1967年間擔任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其日記為了解黨國體制下黨政關係的重要資料。阮的工作日記並非連日書寫，多以出席中央常會的內容為主，類似會議記錄。

¹²¹ 1956年8月，自民黨總務會長石井光次郎率領20多位各界知名人士訪臺，與蔣介石等人會談多次。一般認為石井率團訪問的成果之一，是促成雙方設立有別於正式外交管道的交流平台，此即翌年3月中日合作策進會誕生之由來。1957年4月召開第一回總會，到1971年10月在臺北舉辦最後的第十六屆總會，當時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失去其在國際上代表所謂正統中國的地位，美中接近已是明顯的事實，故參與的日商銳減。有關該會參閱池井優，〈日華協力委員會—戰後日台關係の一考察—〉，《法學研究》，第53卷第2號（1980年2月），頁1-28；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建計畫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臺灣文獻》，第63卷第3期（2012年9月），頁91-124。

¹²² 〈徐慶鐘氏來日〉，《台灣協會報》，第135號，1965年12月，版3。徐赴日有其他任

待徐，慶祝他榮任內政部長，約60人參加。¹²³ 從《臺灣協會報》等資料所見訪日的臺灣人校友，不過是一部分罷了，有的臺灣人校友名字雖然未被報導出來，他們赴日時經常與日本人校友相聚。¹²⁴

二、吉村會長任內蕉葉會的重要成果

研究臺北高校歷史及日治時期高等教育必讀的《台北高等學校》一書，也在吉村會長任內完成。¹²⁵ 1969年，蕉葉會為紀念母校即將迎接創立45周年，計畫編纂《わが臺北高等学校》（暫定名稱），著手展開徵稿。¹²⁶ 率先響應投稿的校友是林宗毅，他所撰寫的文章是了解臺北高校學生閱讀史的重要素材。¹²⁷ 林宗毅出身板橋林本源家族，祖父林維源，父親林祖壽。1944年自臺北高校畢業後，就讀臺北帝大醫學部，戰後進入臺灣大學外文系。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決心赴日，於1950年8月抵達東京，翌年進入東京大學大學院深造。他在日本經商，也曾開設畫廊。¹²⁸ 在日的臺灣人校友投稿者，除了林宗毅以外，僅有石天之樞

務，資料顯示1960年他擔任國民黨副秘書長後，「其間數度奉派赴日，輔導留日青年擁護政府，厥功甚偉。」參見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一）》（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5年），頁92。

¹²³ 〈徐慶鐘氏內務長官就任祝賀會〉，《蕉葉會報》，第14號（1969年1月），頁4。

¹²⁴ 例如楊基銓在追悼同班同學中村正六（太平洋興業株式會社創辦人）時表示，他每次去東京，同班同學為他聚會，中村必定參加。參見楊基銓，〈中村正六追悼の詞〉，收入太平洋興業株式會社編，《故 中村正六 追悼集》（東京：太平洋興業株式會社，2004年），頁21-22。並附一張1967年楊與中村、關壯猷（漁業專家）在銀座街頭的合影。

¹²⁵ 蕉葉會甚早即完成相當於校史的出版品，藉此表達對母校深厚的情感。其他學界常使用的出版品，依序如下：南溟會本部，《南溟會創立四十周年記念誌》（1969年）、榕畔會校史編輯委員會，《榕畔會史》（1978年）、東寧會，《東寧會四十年》（1978年）、綠水會，《台北高商創立六十周年特集号》（1978年）、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窗會，《五十年の歩み》（1981年）、臺北帝大理農學部同窗會，《台北帝国大学理農学部創立六十年記念》（1988年）、臺北帝大工學部同窗會，《鐘韻》（1993年）。

¹²⁶ 〈「わが臺北高等学校」原稿募集〉，《蕉葉會報》，第14號（1969年1月），頁1。

¹²⁷ 〈本部だより〉，《蕉葉會報》，第15號（1969年4月），頁6。

¹²⁸ 林宗毅長年收藏藝術文物，後來捐贈東京國立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等。1990年代以別號南邨出版句集《遲日》，另以林宗文之名出版歌集《美麗島 イラ・フォルモサ》、《スワン・ソング》、句集《青梅雨》。參見蔡錦堂、王麒銘，〈臺北高等學校的校長與教師群像〉，頁183-184。

（1929理乙，在岡山行醫）、張椿蘭（1933理甲，任職工業會社）。¹²⁹ 又令人感到可惜的是，臺灣方面提供稿件的校友只有上述的吳建堂。¹³⁰

蕉葉會積極籌備出版事宜，也呼籲會員踴躍投稿。¹³¹ 該書的購買採預約制，有意購買《わが臺高史》（暫定名稱）者，1970年3月底前須匯款（3千圓，運費另計），未事先預約者日後不予受理。¹³² 為了應付緊鑼密鼓的編務，編輯委員人數增加。該書編輯委員長由土方正己（1929文乙）擔任，他參考一些社史（公司史）、他校的校史之後，覺得有可讀性的沒幾本，認為蕉葉會要完成能吸引讀者的校史。¹³³ 其他委員包括田中正義（1929文甲）、大越伸、鹿沼彰、筒井彌二郎（1930理甲）、長谷川光雄、山口房雄、藏本人司、田中一郎（1943文甲）、林宗毅、宮瀨洋一、羽深人成（終理甲）、高桑末秀（轉校）、安達正。本書的內容主要分成四部。第一部有關於臺北高校的臺灣教育史之敘述，由大越伸撰寫，接著將1922至1946年間的校史分四個階段，各有時代背景介紹（田中正義撰寫），各階段並安排兩場座談會，邀請幾位該時期的校友回顧往事，其中一位是臺灣出身、當時在東京行醫的許淮樵（1931理乙）。¹³⁴ 此外是關於學生抗議事件始末、5位校長的介紹，後者有9位校友執筆，其中吉村邦壽、三井明、賀來宗光（1931理乙）、¹³⁵ 高尾修一（1933理乙）等4位書寫三澤校長的事蹟，可見三

¹²⁹ 王育德雖然沒有投稿，但他的個人文庫中有此書，典藏於東京外國語大學圖書館的王育德文庫。

¹³⁰ 大越伸，〈記念文集の編集雜記〉，《蕉葉會會報》，第19號（1970年9月），頁3。

¹³¹ 〈「わが臺北高等学校」にぜひ投稿を〉，《蕉葉會會報》，第16號（1969年9月），頁1。

¹³² 〈「わが台高史」（仮題）予約募集〉，《蕉葉會會報》，第17號（1970年1月），頁1。

¹³³ 〈立派な「紙碑」を建てよう〉，《蕉葉會會報》，第17號（1970年1月），頁2。土方與臺灣本無淵源，自東京私立開成中學畢業後，隻身來臺就讀臺北高校，東京帝大畢業後，任職《都新聞》，歷任該報文化部長、東京新聞編集局長等職，是著名的編輯。參見土方正己，〈南へのあこがれ〉，《あ、玉杯に花うけて》（東京：有紀書房，1967年）；〈追悼 土方正己氏を偲ぶ〉，《総合ジャーナリズム研究》，第34卷第2號（1997年4月），頁44-49。

¹³⁴ 許淮樵從東京帝大醫學部畢業後，戰前曾任職於三井株式會社の醫務室，戰後任職於駐日代表團的醫務室，之後開設中山醫院，1974年去世。關於其生平介紹參見蔡孟堅，〈悼旅日愛國醫生許淮樵博士〉，《傳記文學》，第24卷第5期（1974年5月），頁53-55。惟文中謂許於「民國十五六年間」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時間有誤，應為1942年。

¹³⁵ 賀來本名郭萬壺，就讀臺北二中、臺北高校、長崎醫科大學，之後長期在長崎當地行醫。他是郭維租醫師（1942年3月理乙）的堂兄。參見曹永洋，〈都市叢林醫生—郭維租的生

澤校長備受敬重。第二部係校友們介紹校園生活及社團活動的文章，座談會則有美術部的座談會，以及劍道部的座談會。第三部收錄師生們的回憶文章計44篇，第四部則是有關學生寮的資料與回憶，最後則是校歌與寮歌集。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本書的標題融入了第一校歌多數的詞句，引人入勝。

不過，或因宣傳不足，1970年3月時預購者不到3百人，5月總會舉辦時也只有約5百人預約，最後約有8百人預約，加以考量臺灣方面的需要，該書印刷一千本。¹³⁶ 承印該書的凸版印刷廠，係1930文甲畢業的松本巖經營的會社。該書出版後八個月，所剩不到40冊，有不少校友購買此書贈人。¹³⁷ 臺灣人校友也有不少人收到此書。例如，在日本的並河宏嶽（1934理乙，原名蕭雲嶽）購買數冊寄回臺灣，分贈徐慶鐘、魏火曜、魏炳炎（1933理甲）、李舉賢（1934理甲）、邱仕榮和翁廷藩（1934理乙）、楊添木和楊祖馨（1935理甲）。¹³⁸ 而讓蕉葉會員感到遺憾的是，不僅是首任會長鉅鹿已經去世，三澤校長的夫人、會員高島良雄（1930文乙）、衣笠襄二（1938理甲）等人也相繼去世，未及得見

涯心路》（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頁33、46。

¹³⁶ 〈「台北高等学校」近く発行至急申込みを〉，《蕉葉会會報》，第18號（1970年4月），頁1；〈蕉葉会総会の記〉，《蕉葉会會報》，第19號（1970年9月），頁7；〈「台北高等学校」拾遺集 その（一）〉，《蕉葉会會報》，第20號（1971年1月），頁3。

¹³⁷ 例如久富良次（1932理乙）有感於該書的質量俱佳，也沒有置入廣告行銷，因而多買一本送給同班同學荒木宣夫的父親，荒木即是前述在軍中時收到《臺高》後還特地寫信回臺者。久富與荒木從臺北高校畢業後就讀千葉醫科大學，大學畢業後，日中戰爭期間兩人都在中國，曾於1940年3月在北京相遇；荒木離開軍中後，回到千葉醫科大學從事研究二年（產婦人科），再到該縣的木更津病院任職，未幾又受召入隊前往南方戰場；到了戰後，久富始終沒有荒木的消息，經與荒木的父親通信後，才確知同學戰歿於緬甸。久富將荒木的事蹟寫入該書，並且贈給荒木的父親，以慰藉老人家思子之情。參見〈「台北高等学校」読後感〉，《蕉葉会會報》，第21號（1971年4月），頁4；〈記念誌「台北高等学校」残部僅少〉，《蕉葉会會報》，第22號（1971年9月），頁2。久富良次，〈二人のクラス主任と旧友〉，《台北高等学校》，頁288-294。還有一位高校同班的勝田恒夫就讀千葉醫科大學。

¹³⁸ 〈會員だより〉，《蕉葉会會報》，第23號（1972年1月），頁4。蕭雲嶽是蕭祥安（1891-1966，曾任公學校教師、法院通譯、辯護士）的長子，熊本醫科大學畢業，1960年代赴日行醫，後歸化日本，1990年去世。參見凌春玉，〈新竹州竹東郡北埔庄第一辯護士—蕭祥安生平事略〉，《新竹文獻》，第70期（2019年4月），頁113-134。

該書之問世。¹³⁹

吉村會長內任另一件大事業是參訪母校。如前所述，當日本開放出國觀光以後，日本人有較多機會重訪臺灣，臺北高校校友也不例外，有的還移地來臺舉辦同學會。例如，李登輝（1943文甲）的日本人同學受訪時回憶，1943（昭和18）年畢業的他們組成「台北高校十八年會」，四十餘年來每年舉行同學會，「偶爾也移師到臺北召開，李總統還在臺灣大學教書與在農復會任職時，甚至在臺北市長任內，也和夫人出席過」。¹⁴⁰臺北高校日本人校友重溫臺灣的記憶，以及照片散見於相關著作。而相當值得回顧的一次，即是1971年12月29日至翌年1月3日（6天5夜），由畢業於臺北高校、臺南一中、臺南一高女者，合組臺灣母校訪問團。全團110餘人，其中來自蕉葉會相關人士有67人，團長、副團長為蕉葉會的鹿沼彰、藏本人司，另一位副團長則是久米貞子（臺南一高女）。1月2日，在師範大學禮堂舉辦創立50週年紀念典禮，晚間在金陵飯店開宴（參加校友166位）。參加這次訪問團的中村裕，距上次1967年訪臺，時隔五年後再度來臺，他非常關心離開聯合國以後的臺灣有何變化，故特地將心得投到《臺灣協會報》，以饗讀者。¹⁴¹1972年1月的蕉葉會新年會有近120人參加，會中由鹿沼報告訪臺之行。¹⁴²同年5月的蕉葉會總會適逢母校創校50週年，參加者有師長8人、校友約200餘人，另有來賓16人，包括後藤文夫等前總督府官僚、臺灣協會理事長田中泰作，以及各校的同窗會代表，例如臺北帝大醫學部（八木俊一）、臺北醫專（下川八男）等多人，共約300人出席，熱鬧非凡。¹⁴³

在1972年這場盛大的蕉葉會總會過後不久，日本與臺灣在政治上斷交。眾所

¹³⁹ 〈あとがき〉，《台北高等学校》，頁442。

¹⁴⁰ 文訊雜誌社編，《信心・智慧與行動》（臺北：文訊雜誌社，1990年），頁20。採訪者為時任《臺灣日報》駐日特派員的記者張茂森，後收入張茂森，《採訪者之眼》（臺北：前衛出版社，2019年）。

¹⁴¹ 〈台湾母校訪問団出発〉，《蕉葉会会報》，第23號（1972年1月），頁2；大越伸，〈台湾訪問団記〉，《蕉葉会会報》，第24號（1972年4月），頁3；中村裕，〈母校訪問団に参加して〉，《台湾協會報》，第209號，1972年2月，版2。

¹⁴² 〈蕉葉會新年互礼会〉，《台湾協會報》，第209號，1972年2月，版2。

¹⁴³ 〈台北高等学校創立五十周年記念事業成功裡に完了〉，《蕉葉会会報》，第25號（1972年10月），頁1；〈台北高等学校創立五十周年記念總會（蕉葉会）〉，《台湾協會報》，第214號，1972年7月，版1。

周知，1960年代中國正值文革期間，也進行核爆試驗，與日本的關係除了經貿往來等，政治上的進展有限。而日本與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間，雖然不是沒有外交問題，但仍時有高層人士互訪，強調「日華關係」之緊密。然而到了1970年代，臺灣的國際地位變化甚鉅，尤其1971年10月，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失去聯合國席次後，日本政府不無可能見風轉舵，雙方關係緊張，這對關心臺灣的日本人而言，是無法忽視的議題。1971年10月，許建裕、劉闊才、張漢裕訪日，蕉葉會成員舉辦懇親會，地點在著名的精養軒，主客約有60人。吉村會長致詞時便表示，在「臺灣問題」議論紛紛之際，臺北高校校友彼此一有機會要深化友誼。¹⁴⁴ 1972年1月，張漢裕與林金生在東京時，也參加了蕉葉會的新年會。¹⁴⁵ 由於世局變化迅速，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中，與中國發表共同聲明、正式建交，隨即國民黨政府對日斷交。因應斷交、為維繫實務關係，同年12月在東京設立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在臺北設立亞東關係協會。¹⁴⁶ 臺日斷交後，兩方雖無邦交，仍不妨礙日本人校友對臺灣的關心，校友依然組團訪問母校。¹⁴⁷

1973年8月，為蕉葉會付出心力多年的會長吉村邦壽去世，享壽65歲。其會

¹⁴⁴ 〈台灣同學生歡迎懇親會〉，《台灣協會報》，第206號，1971年11月，版4。

¹⁴⁵ 〈新年互礼會報告〉，《蕉葉會會報》，第24號（1972年4月），頁2。林此時在日，或與勸邱永漢返臺有關。據邱的說法，1971年底到翌年初，臺灣當局三次派人與他接觸，其中一次的使者為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林金生，拜訪邱的時間是1972年2月11日。對邱而言，年長8歲的林是他臺北高校、東京帝大的學長。參見邱永漢，《邱飯店のメニュー》（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年），頁140-141。1972年4月邱返臺，林也到場接機，當時相關報導甚多。

¹⁴⁶ 關於「日華斷交」在國際法上的意義，參閱李明峻，〈從國際法看臺日關係〉，《臺灣國際法季刊》，第5卷第3期（2008年9月），頁159-187；清水麗，《台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9年），頁176-212。

¹⁴⁷ 根據村上龍平（1935文甲）的記載，1968年他擔任神鋼電機的經營管理部長時，隔週往返伊勢與東京工作，在東京時偶然於新高円寺車站遇見同學豬俣尊志（按：兩人於同年入學，但豬俣晚一年畢業），進而參加以1935文甲同學為主的「鐘鳴會」，除了聚餐、忘年會以外，每年還舉辦各地旅行。1969年第1次在伊良湖岬（位於愛知縣南端），到了斷交後的1979年第11次進而訪臺、重返母校。此外，該會也出版紀念文集。村上除參加鐘鳴會，也參加同屆文理科合辦的「蕉十會」，每年於春秋兩季聚會。參閱村上龍平，《あの人の人》（三重縣：塚本征也發行，1982年），頁129、192-205。

長一職由大越伸（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代理。¹⁴⁸ 1974年的蕉葉會總會決定，由大越伸擔任新會長。翌年，霜三雄（原副會長）繼任會長。¹⁴⁹ 其後，擔任會長者，依序為前田一博（1931文甲）、佐伯喜一、山口房雄、藏本人司。

戰前臺北高校同窗會以臺北為活動重心，未見設立支部；戰後，蕉葉會以東京為重心，對支部的設置並無嚴格的規定，採適當地自行成立的方式。由1979年版的名簿可知，已有18個支部，分別是北海道、仙臺（宮城縣）、靜岡、東海、大阪、神戶（兵庫縣）、岡山、廣島、山陰、松山（愛媛縣）、福岡、佐賀、長崎、大分、宮崎、熊本、鹿兒島、沖繩。¹⁵⁰ 由此可知，在日本的臺北高校校友自1950年代開始有了零星的交流，到了1960年代初期形成蕉葉會，再到1970年代末期，經過約二十年的時間，大致上除了可能校友偏少的地方並未設立支部以外，各地係以主要都市為核心設有支部。比較特別的是，九州（福岡、佐賀、長崎、熊本、大分、宮崎、鹿兒島）各縣以及沖繩縣都設有蕉葉會支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般認為九州和沖繩是日治時期來臺日本人的主體這項事實。

戰後數十年間，當然一定有日本人校友因為各種因素而未參與蕉葉會，也未再來臺灣；有的校友則因年事已高而無法遠行。即使如此，對部分日本人校友而言，臺北高校的記憶始終深藏在心裡。¹⁵¹ 從1960年代即負責編印發行會報長達

¹⁴⁸ 〈弔詞〉，《蕉葉會會報》，第27號（1973年10月），頁2。大越伸指出，臺灣的高官及民間重要人士訪日時（徐慶鐘等人），吉村致力於雙方交流，其數不下百人。

¹⁴⁹ 〈新役員選任〉，《蕉葉會會報》，第29號（1974年10月），頁1；〈蕉葉會新役員〉，《蕉葉會會報》，第31號（1975年10月），頁2。

¹⁵⁰ 《蕉葉會名簿》（東京：蕉葉會，1979年）。

¹⁵¹ 以著名的中國古代及中世史學者、名古屋大學名譽教授宇都宮清吉（1928文乙）為例。根據臺師大歷史學系退休教授邱添生之回憶，1987年宇都宮的學生、時任京都大學教授的谷川道雄應聘來臺灣大學講學，「行前去探望恩師宇都宮清吉。那時候宇都宮先生已經八、九十歲了，很懷念自己的母校，他跟谷川先生提到，聽說韓國民族性比較不一樣，國內很多日治時代的建築都被毀掉，連朝鮮總督府都把它拆掉了，而另外蓋青瓦臺；但聽說臺灣的總督府還在，我的母校臺北高校那紅磚的建築也都還在，你到時候不妨替我去看看。日治時代臺北高等學校的校舍，也就是現在臺灣師範大學，所以我就藉谷川先生來臺講學之便，請他到師大來為研究生作一次專題演講。在演講之前，我先帶他參觀師大校園」。谷川教授拍下師大著名的紅磚建築，即早年宇都宮學生時代的教室所在。參閱楊憶頻訪談整理，〈臺灣學者的留日經驗（1968-1971）——邱添生教授口述訪談錄〉，《歷史教育》，第16期（2010年6月），頁46-47。該文收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編，《師大歷史·記憶 系友訪談錄1》（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9年），頁102-177。

半世紀以上、自2005年起擔任第九任（最後一任）蕉葉會長的藏本人司，於2015年去世，同年蕉葉會解散，邁入歷史，是日本方面有關日治時期臺灣高等教育機關之同窗會最後結束者。¹⁵² 目前臺北高校日本人畢業生日漸凋零，同世代臺灣人校友也一一離開人世。蕉葉會最後一任副會長德丸薩郎等熱心的會員，發願要製作最後一本名簿。根據德丸的計算，2012年時會員仍健在者有380人，到2017年已有140人去世（相當於近4成會員在五年內往生），76人消息不明（未回信、調查有未盡之處），確知健在者僅164人。這種情況更加促使平均年齡在90歲上下的臺北高校校友等人感到有必要做聯繫。¹⁵³ 無論最後成果為何，散居日本各地的臺北高校校友及肄業生終有一天歸零，然而他們所留下的文集、照片、物件等，將繼續承載跨越國境的記憶，足供後人追憶。

伍、結論

1922年成立的臺北高校是日本殖民地臺灣的高等教育機關之一，致力於培植國家未來的菁英。在這所臺灣唯一的高校校園裡，師長們傳道、授業、解惑，學生們在此求知，獲得啟迪，並享受青春該有的燦爛美好。該校主要成員為日本人教師與學生，臺灣人學生僅占約四分之一比例。臺北高校同窗會設在校內，由在臺北的畢業生負責運作，平時校友不乏機會親近母校、拜訪老師、指導學弟，然而到了二次大戰後期，這樣的活動已無餘裕進行。戰爭時期該會活動的細節不得而知，有待發掘同窗會的會報。

1945年戰爭結束後，日本人必須離開臺灣，各奔前程，而從外地回國的他們，面臨再就職、轉學等現實的生計問題，在各方面均處於不安狀態的日本社會中，人際關係的經營極不容易。他們住在日本，回想曾在臺灣度過的年華，不免懷念臺灣的點滴。約1950年前後，在東京等地出現以蕉葉會為名的聚會，也有人

¹⁵² 德丸薩郎，〈あとがき〉，《蕉葉会名簿開校90周年記念最終名簿補正版》（2015年）；〈蕉葉会の閉幕〉，《台湾協会報》，第727號，2015年4月，版4。

¹⁵³ 德丸薩郎，〈蕉葉会健在者調査のお願い〉（2017年8月25日，筆者參加蕉兵會活動時獲贈此小冊）。

用該會的名義在克難之中編成名簿。囿於當時的條件不佳，這些稱不上是健全的組織，惟臺北高校日本人校友重建同窗會的使命感，實屬難能可貴。隨著日本逐漸走向經濟繁榮，此一時期臺北高校師生有機會久別重逢，進而時相往還。整體而言，在戰後日本所成立與臺灣相關的各種校友會及同窗會中，蕉葉會成員由於有較多人居社會各界的中堅、甚至是領導階層，經常是眾所矚目的焦點。1960年代以降，透過總會選出會長，在其之下有副會長、常任幹事等人分工合作，使會務更上軌道，發揮更多功能，而有能力定期舉辦新年會與總會，並在該會的會報及臺灣協會發行的會報上刊登報告。凡此背後都有賴校友們盡心盡力，始得長年維持活動的能量。

在大型活動以外，同屆或同班及同住一地者舉辦的聚會，所在多有。蕉葉會成員也熱衷於參加日本寮歌祭，延續臺北高校獨有的特色。臺北高校校友遍布日本全國，蕉葉會的支部也在各地耕耘。尤其值得特書的是，蕉葉會成員編纂《台北高等學校》一書，於1970年出版，書寫已然消失的校史，傳遞共同的記憶，可謂心血結晶。此外，他們也編印文集，用以紀念同屆或同班情誼，甚至在戰爭末期入學的在校生，也為了保存「學徒兵」經驗而編印文集。這些寶貴的文字記錄，有助於臺灣教育史研究。凡此均可見臺北高校畢業生之間的連帶關係，以及戰爭結束時學生之間的一體感，確實極為強韌。

蕉葉會的存在與其他臺灣關係團體一樣，也是建立在另一個新的基礎之上，亦即戰後日本與臺灣在特殊的國際情勢下重新交流。在這種過程中，不復只是圍繞一間學校的個別歷史而已，實際上已與戰後的臺日關係密不可分。要之，該會不僅提供日籍師生維繫情誼、擴張人脈的管道，也是日本人校友與臺灣人校友彼此強化人際關係的重要途徑。

本文以臺北高校同窗會為主軸，解明蕉葉會成立的時代背景，重建其活動梗概，加深對臺北高校歷史的認識，也呈現同窗會研究對臺日關係史的重要意義。關於1972年斷交以後的蕉葉會、臺灣方面臺灣人校友組成的臺高同學會之詳情，以及兩個同學會間跨國的互動關係與活動等相關課題，留待日後再行探討。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大田周夫舊藏資料》（東京，國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教育圖書館藏）
〈引揚教職員名簿〉。
〈台大教授、其ノ他轉職希望者調（第二回）〉。
《臺灣總督府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大正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三卷秘書〉。
〈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三卷秘書〉。
〈明治四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高）第一卷秘書〉。
〈昭和四年四月至六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
〈昭和六年七月至九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
〈昭和九年一月至三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
〈昭和十三年一月至三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
〈昭和十四年六月至八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
〈昭和十五年九月至十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
〈昭和十六年五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
〈昭和十六年七月至八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

二、資料集、名錄

- 《さあれ七星の学び舎に》。出版地不詳：舊制臺北高校昭和十九年入學文科生，1999年。
二十年蕉葉會編，《ペガサス20 卒業四十五周年記念》。出版地不詳：二十年蕉葉會，1990年。
二十年蕉葉會編，《ペガサス20 卒業五十周年記念》。出版地不詳：二十年蕉葉會，1995年。
十五蕉葉會編，《回顧・五十年》。出版地不詳：十五蕉葉會，1991年。
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一）》。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5年。

- 《台北高等学校》。東京：蕉葉會，1970年。
- 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編，《台湾・補償・痛恨：台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東京：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1993年。
- 河原功編，《資料集 終戦直後の台湾》。東京：不二出版，2015年。
- 財團法人臺灣協會，《台湾同窓会便覧》。東京：財團法人臺灣協會，1995年。
- 財團法人臺灣協會，《台湾協会会員名簿》。東京：財團法人臺灣協會，1989年。
- 許雪姬編，《臺灣重建協會與二二八事件文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7年。
- 《會員名簿》。臺北：臺高同窗會，1941年。
- 《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自昭和三年至昭和四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1929年。
- 《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一覽（昭和十二年度）》。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1937年。
- 《蕉葉会名簿開校90周年記念最終名簿補正版》。無版權頁，2015年。
- 《蕉葉会名簿》。東京：蕉葉會，1956年、1958年、1966年、1979年。
- 《蕉葉会名簿（2005-2009年版）》。東京：蕉葉會，2004年。
- 藏本人司、徳丸薩郎，《旧制台北高等学校戦没者名簿》。東京：臺北高等學校蕉葉會，2007年。

三、日記、文集、書信、回憶錄、訪談錄

- 小田俊郎，《続南船北馬》。私家版，1970年。
- 小田滋，《堀内・小田家三代百年の台湾——台湾の医事・衛生を軸として——》。東京：近代文藝社，2010年（増補版）。
- 王育德著，近藤明理編，《「昭和」を生きた台湾青年：日本に亡命した台湾独立運動者の回想 1924-1949》。東京：草思社，2011年。
- 〈王育德先生日記〉，未刊本，王明理女士提供。
- 〈日下宗治致筆者信函〉（2017年8月24日、2018年1月4日），手稿。
- 甲斐文比古，《国境を越えた友情》。東京：東京新聞出版局，1990年。
- 《台湾口述歴史研究》，第4集。東京：東京女子大學栗原研究室，2011年3月。
- 竹下流彩，《句集 続 港》。東京：角川書店，1992年。

竹下流彩，《隨想 港》。東京：角川書店，2008年。

〈伊藤圭典訪談筆記〉，未刊稿。

村上龍平，《あの人この人》。三重縣：塚本征也發行，1982年。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二十五）〉，《傳記文學》，第91卷第3期（2007年9月）。

林金雄，《かかみの雜記》。岐阜：教育出版文化協會，1978年。

高橋潤子編，〈メール&FAXによる「しょうへい会」第1回〉，2020年6月。

高峰一愚口述、所澤潤訪問，〈聞取り調査：外地の進学体験（IX）・特別篇
台北帝国大学学生主事補、台北高等学校教授の体験を中心に〉，《群馬大
学教育学部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編》，第53卷（2004年）。

〈鉅鹿直賢致筆者信函〉（2012年6月），手稿。

御厨貴編，《園部逸夫園部逸夫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タテ社会をヨコに生き
て》。京都：法律文化社，2013年。

徳丸薩郎，〈蕉葉会健在者調査のお願い〉，手稿，2017年8月25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編，《師大歷史・記憶 系友訪談錄1》。臺北：秀
威資訊科技公司，2019年。

楊基銓，《台湾に生を享けて》。東京：日本評論社，1999年。

楊基銓，《楊基銓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

楊憶頻訪談整理，〈臺灣學者的留日經驗（1968-1971）——邱添生教授口述訪
談錄〉，《歷史教育》，第16期（2010年6月）。

蔡錦堂主訪，徐聖凱著，《黃伯超先生傳》。臺北：前衛出版社，2012年。

鍾淑敏、詹素娟、張隆志訪問，吳美慧、謝仕淵、謝奇鋒、蔡峙紀錄，《曹永和
院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年。

四、雜誌、報紙

《北国新聞》，金澤，2015年。

《台湾協會報》，東京，1963-2015年。

《民報》，臺北，1946年。

《愛光新聞》，橫濱，1955-1961年。

《臺高》，臺北，1937-1938年。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2-1941年。

《蕉葉会會報》，東京，1961-1975年。

五、專書

《あゝ玉杯に花うけて》。東京：有紀書房，1967年。

ジョージ・H・カー著，蕭成美譯，川平朝清監修，《裏切られた台湾》。東京：同時代社，2006年。

《しょうへい 蕉兵五十周年記念文集》。出版地不詳：蕉兵會，1996年。

《わが青春・旧制高校》。東京：ノーベル書房，1977年。

大原一三，《「パンとサーカス」の時代》。東京：フォレスト出版株式會社，1999年。

《大川市郎君追悼文集》。日野原昌、丸本時雄發行，2005年。

大原一三，《人間万事塞翁が馬》。宮崎：宮日文化情報センター，2005年。

小田俊郎，《むさしの春秋》。東京：日本醫事新報社，1980年。

小田俊郎，《小田俊郎教授開講十周年記念業績集》。大阪：大阪市立大學醫學部第一內科學教室，1958年。

小田俊郎，《小田俊郎教授業績集》。大阪：大阪市立大學醫學部第一內科教室，1965年。

山口房雄編集，《獅子頭山讃歌：自治と自由の鐘が鳴る》。東京：舊制台北高等學校記念文集刊行委員会，2003年。

太洋興業株式會社編，《故 中村正六 追悼集》。東京：太洋興業株式會社，2004年。

《回顧即感謝 清水護先生百歳記念誌》。東京：清水護先生百歳記念誌刊行會，2008年。

台灣協會編，《台灣引揚史》。東京：台灣協會，1982年。

永田久光編，《ビジネスマンへの提言》。東京：大和書房，1963年。

林初梅、所澤潤編，《戰後臺灣的日本記憶——重返再現戰後的時空》。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7年。

邱永漢，《邱飯店のメニュー》。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年。

《荒川重理先生の思い出》。荒川先生の會，1977年。

莊健隆，《臺南莊黃兩個家族——莊維藩與黃京華的故事》。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20年。

津田勤子，《戦時下台湾の高等学校生と文芸：旧制台北高等学校「雲葉」と「杏」雑誌から見るエリート学生達の世界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7年。

- 《徐公慶鐘辭世十周年（百歲冥誕）追思集》。臺北：徐慶鐘追思集編撰小組，2006年。
-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新北：Airiti Press，2012年。
- 清水護編，《台湾に生きた清水源次郎を偲ぶ》。東京：編者發行，2003年。
- 清水麗，《台湾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9年。
- 陳文松，《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
- 張茂森，《採訪者之眼》。臺北：前衛出版社，2019年。
- 森田俊介，《內台五十年》。東京：伸共社，1979年。
- 森於菟，《父親としての森鷗外》。東京：筑摩書房，1969年。
- 曹永洋，《都市叢林醫生——郭維租的生涯心路》。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
- 園部逸夫，《旧制高等学校の栄光と残照》。出版地不詳：森下恭子發行，2013年。
- 福山琢磨編，《孫たちへの証言》，第6集。大阪：新風書房，1993年。
- 《蕉蕾集》。東京：蕉葉會，1966年。
- 蔡錦堂，《立法院院長劉闊才傳記》。臺中：立法院議政博物館，2015年。
- 蔡錦堂編，《「臺北高等學校創立9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4年。
- 《瀨邊惠鎧先生の回想》。東京：瀨邊先生記念出版會，1981年。
- 羅啟源治喪委員會編，《羅啟源先生紀念集》。出版項不詳，1974年。
- 舊制高等學校資料保存會監修，《白線帽の青春 西日本篇》。東京：國書刊行會，1989年。

六、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 中村裕，〈旧制台北高校を偲んで〉，《實業之日本》，第67卷第8號（1964年4月）。
- 吉見吉昭，〈台北高校の先生方〉，《臺高・師大通訊》，第3期（2021年5月）。
- 池井優，〈日華協力委員会一戦後日台関係の一考察〉，《法學研究》，第53卷第2號（1980年2月）。

- 吳文星，〈戰後初年在臺日本人留用政策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5年6月）。
- 李明峻，〈從國際法看臺日關係〉，《臺灣國際法季刊》，第5卷第3期（2008年9月）。
- 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建計畫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臺灣文獻》，第63卷第3期（2012年9月）。
- 若杉治郎，〈だぶだぶズボン物語〉，《文藝春秋》，第34卷第3號（1956年3月）。
- 長崎明，〈わが道を求めて（最終回）〉，《にいがたの教育情報》，第29號（1991年7月）。
- 周婉窈，〈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1928-1960）〉，《臺大歷史學報》，第61期（2018年6月）。
- 〈追悼 土方正巳氏を偲ぶ〉，《総合ジャーナリズム研究》，第34卷第2號（1997年4月）。
- 津田勤子，〈日治末期台湾エリート青年の台湾描写——台北高校回覧雑誌『杏』を例に——〉，《文史臺灣學報》，第13期（2019年10月）。
- 津田勤子，〈日治時期臺籍高校生作品研究——以臺北高等學校《臺高》、《翔風》為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31期（2020年10月）。
- 凌春玉，〈新竹州竹東郡北埔庄第一辯護士——蕭祥安生平事略〉，《新竹文獻》，第70期（2019年4月）。
- 陳建仁，〈李登輝總統為我上的最後一堂課〉，《臺高・師大通訊》，第2期（2020年10月）。
- 飯田泰三，〈中村哲先生の略歴〉，《沖繩文化研究》，第31號（2004年8月）。
- 黃紹恆，〈臺北帝國大學經濟學講座的誕生與發展〉，收入蔡祝青編，《迎向臺大百年學術傳承講座 I：臺北帝大文政學部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年。
- 歐素瑛，〈臺北高校與臺北帝大知識與人脈的流動：以瀨邊惠鎧為中心〉，《臺灣文獻》，第69卷第4期（2018年12月）。
- 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國史館學術集刊》，第3期（2003年9月）。
- 蔡孟堅，〈悼旅日愛國醫生許淮樵博士〉，《傳記文學》，第24卷第5期（1974年5月）。

蔡錦堂，〈日本治臺後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收入亞東關係協會編，《2007年臺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臺北：外交部，2007年。

蔡錦堂，〈新竹中學校出身的臺北高等學校生初探〉，《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0期（2017年12月）。

鍾淑敏，〈台北高校の師弟と戦後の日台関係における人脈の展開〉，收入檜山幸夫編，《轉換期の台湾史研究》。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2015年。

鍾淑敏，〈戰後日本臺灣協會的重建〉，收入許雪姬編，《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年。

顏杏如，〈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在臺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收入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論集》。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8年。

七、學位論文

林祐里，〈「灣生」川平朝清與其家族探討：臺灣、琉球與日本的邂逅〉。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

徐紹綱，〈臺北高等學校學徒兵的徵召與實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年。

陳鈺琪，〈王育德與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年。

賴冠玟，〈新舊政權夾縫中的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1945-194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年。

八、網路資料

〈台北高校の先生方〉，收入「吉見吉昭のホームページ」：<http://yoshimi-yoshiaki.la.coocan.jp/index.htm>（2021/6/4點閱）。

〈『裏切られた台湾』に込められた思い——「湾生」・川平朝清さんに聞く〉，收入「Nippon.com」：<https://www.nippon.com/ja/people/e00094/?pnum=1>（2021/2/28點閱）。